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

张笑夷 著

2014-10-31T16:00:00+00:00

A Study of Lefebvre's Critical
Theory of Space

张笑夷……著

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

空间

时间

和

日常生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张笑夷 1979年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论文有《论列斐伏尔节奏分析视域下的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列斐伏尔关于都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交流》2013年第3期）等。

张笑夷……著

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

A Study of Lefebvre's Critical Theory of Spa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 导论
 - 第一章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的理论视域与方法
 - 第一节 理论缘起：理论危机与现实契机
 - 第二节 理论视域：现代性批判
 - 第三节 研究范式：三元辩证法
 - 第二章 列斐伏尔对空间概念的考察
 - 第一节 历史中的空间：空间概念历史变迁的批判性分析
 - 第二节 社会空间：一个生产性的总体性概念
 - 第三节 空间的历史：人类“史前史”的空间图绘
 -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幸存与“空间的生产”
 - 第一节 资本界限的激活：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
 - 第二节 国家和政治权力是空间生产的“管理者”
 - 第三节 空间生产的微观机制之一：都市化
 - 第四节 空间生产的微观机制之二：日常生活的被规划
 - 第四章 空间的矛盾性与总体性革命
 - 第一节 矛盾性的空间：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 第二节 “试验性的乌托邦”：探索另一个可能的世界
 - 第三节 对革命的再思考
 - 第五章 从空间分析走向节奏分析
 - 第一节 节奏概念与节奏分析方法的内涵
 - 第二节 时间与空间的节奏化组织
 - 第三节 线性重复的社会时间生产的微观权力机制
 - 第四节 反抗线性重复的持久努力
 - 第六章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的理论启示
 - 第一节 空间批判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
 - 第二节 空间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导论

20 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把人们从对理性的痴梦中惊醒，启蒙运动所弘扬的理性精神走向了反面。科学技术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甚至消灭人的异化力量，由理性原则组织和规划的社会已然成为不适宜人居住的异化社会。这也就不难想象学生造反运动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现，而且是在全球同时出现。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运动、革命和经济危机等接踵而至的阻挠停住脚步，恰恰相反，在经历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生产关系变革后，它似乎显得更加牢不可破。当今，在被冠以“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等一系列名号的资本主义社会面前，人们——包括曾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愿意重复“**别无选择**”这个口号，而不是“**改变现实**”。在资本主义虚假的强势面前，共产主义运动一再受挫。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无产阶级便可抓住时机，进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远比马克思的构想复杂，一些新的情况是马克思所未曾预见到的。虽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均以失败收场。更令人扼腕的是，苏联社会主义也未前行多远便轰然倒下。

这个时代需要马克思的学说，因为只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全面和最深刻的分析，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最透彻的论证。诚如伊格尔顿所言：“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1]确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这个时代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前所未有的发展。这表现为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并存。“一方面，它同当代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其他理论成果交汇形成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它被运用于不同地区的实际革命进程，由此而导致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型，即社会主义模式。这样，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形态便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2]在这些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不仅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等。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张和观点互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但他们大多秉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强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变革。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尤为典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甚多，观点各异。大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人本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强调“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理性文化的审查和批判。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物化结构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禁锢；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理性依赖于神话，驱除了神话，却最终退化为神话，走向了自我毁灭；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对人全方位控制因而全面压抑人的单向度社会；等等。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老年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以此捍卫马克思。比如，阿尔都塞关注科学方法论结构和客观规律，拒斥非历史的人和主体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既非人道主义也非历史主义。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出现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尽管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它们仍试图在新的条件下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寻求解放之路。

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何种方式进入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否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但有如下三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 20 世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社会空间、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现代国家、现代性机制等的批判和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以及新的存续机制。结论表明，资本主义正试图强制性地调动一切资源和要素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尤其是通过把技术理性文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等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操控机制来维持自身。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准确地揭示了当代人的命运。在一个由理性原则或理性文化所构筑的同质性的社会中，无论是社会、自然、他人、自我、劳动等皆以陌生和敌对的样态出现，人处于一个总体异化的境遇中。可悲的是，大部分人并不自知自己的异化，反而盲目甚至麻木地接受并参与异化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存在主义所言之“被抛”用以形容当代人的命运是再恰当不过。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意识到了 20 世纪出现的“文化危机”，并自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范式的回归，使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3]。当资本主义实现了外在的、物质的强力控制机制，向总体化的、文化的操纵机制转化时，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还仅停留在经济主题上，忽略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那么它就注定被抛弃。在重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得尤为出色。“在这里，关于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文化价值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同样具有内在统一的特点。”^[4]总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文化焦虑的时代”诞生的“文化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的境况和人的遭遇，而且运用文化哲学范式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视域。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确切地说，在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有这样一

位思想家：他坚持不懈地对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日常生活进行精细的分析和激烈的批判，并满怀希望地呼唤着总体性革命的到来；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但同时又率先颠覆了马克思学说中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性地位，代之以“空间的生产”；他因为日常生活批判而赢得理论界的认可，更因为空间批判理论而获得广泛的赞誉和关注；他像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从事着文化批判，但他关注的领域远远超过了政治和文化领域；他像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人类思想文化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没有哪种思想像他的空间批判理论那样被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众多学科所追捧。他就是列斐伏尔。

一 列斐伏尔的学术路径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又译亨利·勒菲弗、亨利·列斐伏尔等）是法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在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列斐伏尔为后世留下了60多部个人著作和发表在多家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以及一些由他主持出版的马克思、黑格尔、列宁的著作。列斐伏尔以多变和挑衅的风格不断地介入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他的作品广泛地涉及了日常生活、空间、时间、历史、文学、建筑等领域，他的传奇一生^[5]和学术历险是对20世纪最好的注解。爱德华·索亚（E.W.Soja，又译爱德华·索杰）曾这样评价：“在1991年静静地‘消失’的不是亨利·列斐伏尔，而是20世纪本身。”^[6]

日常生活批判贯穿列斐伏尔的整个学术生涯，是其最伟大的思想贡献。列斐伏尔正是因为关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系列著作，而与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并驾齐驱，进入了20世纪社会批判理论大师的行列。无论时代如何变幻，日常永远是列斐伏尔对社会变革的社会学探究和哲学反思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领域。列斐伏尔认为自己采取定期更新系列著作来研究日常生活的方式，保证了理论与重大社会变化的历史分期的一致性。因此，分别出版于1947年、1961年和1981年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以及在他生命最后通过节奏分析方法对日常生活的再考察可以被视为列斐伏尔思想的界标和里程碑。本书根据前后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日常生活批判系列著作对列斐伏尔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行分期。从总体上，我们可以把列斐伏尔的学术生涯划分为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确立，以现代性为思考原点对都市、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的社会变迁中对日常生活的再审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其学术生涯的开端到《现代性导论》出版之前（时间上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末），这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阐释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初步确立的阶段。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列斐伏尔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法国学术界。1928年，他与一批年轻的哲学家创办了法国第一个马克思主

义哲学刊物《马克思主义杂志》。从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列斐伏尔在大学教授哲学，并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二战后，他重新活跃于法国思想界。列斐伏尔遵循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国的非共产信仰的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势力。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与古特曼合著的《被神秘化的意识》（1936 年），《反民族的民族主义》（1937 年），与古特曼合著的《列宁论黑格尔辩证法的笔记》、《黑格尔文选》、《希特勒掌权，或法西斯德国五年总结》（1938 年），《尼采》、《辩证唯物主义》（1939 年），《存在主义》（1946 年），《笛卡尔》、《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日常生活批判 I：导论》（1947 年），《马克思主义》、《论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1948 年），《美学概论》（1953 年），《论对列宁思想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论德国》（1957 年），《总结及其他》（1959 年）。其中，《被神秘化的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和《日常生活批判 I：导论》是列斐伏尔的代表作。在这一思想阶段，他因日常生活批判以及异化、人道主义、青年马克思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等人齐名，被誉为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

第二个阶段是以《现代性导论》为界标到《日常生活批判 III：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出版之前（时间上大约从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这是列斐伏尔以现代性问题为思考原点对当代新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段。这一阶段以 1968 年学生运动为界标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 60 年代初到 1968 年学生运动之前，是列斐伏尔现代性思想确立和从事城市和日常生活批判的社会学研究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含编著）有《现代性导论》、《日常生活批判 II：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1962 年），《乡村的谷底——乡村社会学研究》、与古特曼合编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一卷）（1963 年），《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文集》（第二卷）（1964 年），《元哲学》、《比利牛斯山》、《公社宣言》（1965 年），《马克思的社会学》、《语言与社会》（1966 年），《立场：反对技术官僚论》（1967 年），《爆炸：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城市的权利》、《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 年）。其中，《现代性导论》、《日常生活批判 II：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学》、《城市的权利》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是列斐伏尔的代表作。其实，从 50 年代开始，列斐伏尔就有了除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另一个“乡村社会学家”的身份。在这一思想时期，他凭借马克思主义思想框架，在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社会语言学以及日常社会学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被法国社会学界公认为这些领域的奠基人。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以《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为其研究顶峰。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基础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把当时的西方社会定义为“消费受控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列斐伏尔认为，在这种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种全方位的工具理性主义通过“技术专家治国制”（technocracy）隐蔽地“规划”日常生活。“日

常生活已不再是富有潜在主体性的‘主体’；它已经变成社会组织系统的‘客体’。”^[7]

第二个时期从 1968 年学生运动到 70 年代末，是列斐伏尔以空间、国家、都市和日常生活为主题进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根据列斐伏尔的权威研究专家米歇尔·特雷比奇（Michel Trebitsch）的观点，列斐伏尔对空间和城市问题的研究深受 1968 年学生运动的影响。作为南泰尔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列斐伏尔在 1968 年的反抗运动中对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提出的“改造生活”、“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让日常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等在“五月风暴”中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列斐伏尔将学生视为社会解放、实现“总体人”这一终极目标的代言人。1968 年 2 月，列斐伏尔远赴日本，与全日本学生自治团体联合会（Zengakuren）取得了联系。5 月，在南泰尔学院，列斐伏尔不仅站在反抗运动的最前线，积极保护学生并与运动的领导人一起参加电视访谈，而且透过反抗运动现象冷静思考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列斐伏尔发现，“当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还没有被推翻，国家权力的基础仍然牢固时，理智、道德和精神的‘上层建筑’已经倒塌了。而且他认为这才是关键之点。”^[8]可以说，人类遭遇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普遍的文化危机，并且这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危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根本性的，从日常生活到政府机构和国家，把一切都紧紧连在一起。”^[9]列斐伏尔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正是对 1968 年事件凸显的深层文化问题的反思，是对新资本主义社会实践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如何在新形式下展开的思考。这一时期列斐伏尔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历史的终结》、《从乡村到都市》、《都市革命》、《空间的政治学反思》（1970 年），《差异化宣言》、《恩格斯与乌托邦》（1971 年），《马克思的思想与城市》（1972 年），《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利》第二卷）、《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 年），《空间的生产》（1974 年），《被忽略的时光》、《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幽灵的王国》、《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1975 年），《论国家之一：近代的国家》、《论国家之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从黑格尔到毛泽东》（1976 年），《论国家之三：国营生产方式》（1977 年），《论国家之四：现代国家的矛盾——国家的辩证法》（1978 年）。在这一时期，以《空间的生产》为代表的一系列空间批判理论著作使列斐伏尔再一次声名鹊起，赢得了广泛赞誉。学界普遍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福柯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索亚更是将列斐伏尔称作“富有原创性和首屈一指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10]，他对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问题的讨论将改变人们对于空间、时间、存在、地理、历史以及历史的创造、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实践意识的看法，他的空间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唯物论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后世引经据典的依据。

第三个阶段是以《日常生活批判 III：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为界标到逝世前《节奏分析要素：节奏知识导论》的完成（时间大约从 80 年代初到 1991 年）。列斐伏尔认为，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到来，“现代性的终结”作为问题被提上日程。在他看来，这预示着一场伟大的变革。现代性终结了，现代主义取代了

现代性，实现哲学的时机错过了。悲观情绪一直弥漫在列斐伏尔后期的著作中，早在1978年，列斐伏尔就曾写了一部意味深长的书——《革命不再如此》。即便这样，列斐伏尔依然对日常生活展开不懈的研究。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批判Ⅲ：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论日常生活的元哲学）》（1981年），《辩证法的复归》、《论近代的十二个关键词》、《卢卡奇于1955年》（1986年）和《节奏分析要素：节奏知识导论》（1992年）等。在这一历史时期重新开始日常生活研究，列斐伏尔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解决第二卷遗留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分析。他试图阐释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化，日常生活由传统社会文化的“剩余物”变成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生产方式竭力通过规划这个基础而将自身构造为一个多种等价体系组成的系统。第二，面对思想批判能力的丧失正成为社会常态的这种更深刻的危机，列斐伏尔试图走向每日生活的元哲学，探讨日常生活批判作为哲学何以可能、是否可以成为走出现代社会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并赋予生活以意义。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城市、日常生活；空间、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和其学术生涯的运动轨迹，是列斐伏尔探索新人道主义和“总体的人”的实现的艰难而又辉煌的思想旅程。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的研究

国内对于列斐伏尔思想的译介比较早，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出版的译著主要有：《美学概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三联书店，1966年）；《狄德罗的思想与著作》（商务印书馆，1985年）；《论国家》（重庆出版社，1988年）；《从黑格尔到毛泽东》（台北：结构群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译文、访谈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原载法国《人与社会》杂志1976年41~42期合刊，张伯霖摘译刊于《哲学译丛》，1980年第5期；《列费弗尔：研究日常生活的哲学家——列费弗尔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状况》，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9期。2003年开始有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方面的编著问世：包亚明先生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都市与文化》第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重点介绍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2008年，又出版了《空间与政治》（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但是，列斐伏尔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以及《空间的生产》等空间、城市方面的著作至今没有中译本。

从80年代开始，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初步介绍其思想。这一时期主要有：李青宜先生的《今日法国哲学界一斑——访问法国几位著名哲学家》，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

1983年第4期;俞吾金、陈学明先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周穗明先生的《“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1世纪之初,衣俊卿等人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张一兵、胡大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将列斐伏尔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辟专门章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列斐伏尔早期的异化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近年来,有两本系统解读列斐伏尔思想的专著问世:刘怀玉的《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紧紧围绕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概念,对其《辩证唯物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现代性导论》、《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以及《空间的生产》等著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文本解读。吴宁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着重考察了列斐伏尔的自然观、节奏观、女性观、资本主义观、哲学观、马克思主义观,论述了他的异化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美学理论、国家理论、现代性理论和空间理论。

此外,仰海峰的《列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刘怀玉的《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前后转变》(《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吴宁的《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探析》(《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黄继锋的《日常生活与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以及褚当阳和姜大云的《日常生活的主体迷失与重新占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等一系列论文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解读。刘怀玉的《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本质批判》(《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吴宁的《列斐伏尔现代性理论的思想渊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张双利的《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思想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陆扬的《列斐伏尔:文学与现代性视域中的日常生活批判》(《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等论文对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都认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就列斐伏尔的国家观、异化观、资本主义观、政治观、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成果相对较少。

2. 关于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研究

国内尚未有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系列著作的中译本和研究专著出版。刘怀玉和吴宁在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的专著和关于空间批判的论文中,解读了他的空间批判理论。

刘怀玉首先在其专著中阐明其立论基础之一是“‘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发生过两次转折：第一次是从一般的日常生活批判或意识形态的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转向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第二次是从现代性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后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与特征，即‘空间化’特征的研究”，他强调他主要研究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第一次转折。也就是说，他将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视作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第二次转折。他的专著虽涉及“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化转向”，但主要立足于《空间的生产》的文本解读。他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及其再现性空间理论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根本改造，是对整个现代性的历史观念与主体观念、实体论与本体论的一次根本动摇，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直线型历史进步过程与否定之否定式辩证法发展观念受到了根本挑战。他认为列斐伏尔转向对“空间的生产”的分析，并不仅仅是要建构一种空间维度的本体论，而是通过一个新的批判与分析的焦点，提出一种新的政治构想。

吴宁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相独立的理论，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使他走向了更为深刻的空间理论与城市空间社会学。但她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与意义，列斐伏尔关注空间的政治、经济价值而忽视了空间与文化的关系。

此外，李春敏的《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认为列斐伏尔从社会空间出发，通过对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化改造，并从中寻求革命的出路。赵海月和赫曦滢的《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辨识与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认为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间为基础，通过对空间的三元辩证分析，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而且阐述了抽象空间逻辑内含的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矛盾。尤作欣的《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从晚年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李秀玲和秦龙的《“空间生产”思想：从马克思经列斐伏尔到哈维》（《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王弋璇的《列斐伏尔与福柯在空间维度的思想对话》（《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等论文在比较的视域中分析了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在思想史上的独特性。陈忠的《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高峰的《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等论文就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对城市建设和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总体来说，国内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少，而且研究相对零散。而现有的研究也更大程度地局限在对列斐伏尔思想的复制、总结、概括和提炼上。这种境况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研究现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是，国内尚未出现专门系统化地评介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著作，即使现有的相关研究论文也只是比较初步地介绍了该理论或者该理论的某个方面。事实上，空间批判理论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博大得多，它涉及生产方式、国

家、历史、符码、逻辑、哲学、政治、日常、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和都市等现代社会的重要主题。关键在于，以上要素是如何共同作用并将这种复杂的作用表现在空间的生产中。只有理解了与空间相关的一系列要素以及空间与这些要素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空间批判理论的缘起、内容、逻辑和旨趣。并且，只有深入地理解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也才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而不是单就某个问题论某个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 列斐伏尔思想的历史浮沉

在西方学界，列斐伏尔思想的研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备受关注时期。此段时期，列斐伏尔被认为是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典范，是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异化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佩里·安德森认为他不仅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最早的奠基人之一，而且在战后的头十年间也“仍然是党内最著名、最富有创建性的哲学家”。他既不像青年卢卡奇那样对革命的未来盲目乐观，也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对历史前景莫名悲观。

第二阶段，70 年代到列斐伏尔逝世前遭到冷落。1968 年学生运动后，西方思想界精英纷纷倒戈“向右转”，随着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列斐伏尔逐渐被挤出思想中心遭到冷落，而这一时期，他有大量重要的著作问世。这一时期，英语学界几乎听不到列斐伏尔的声音，与萨特、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等其他法国当代思想家相比，列斐伏尔著作的译介和研究甚少，一些研究著作对列斐伏尔思想大都是一带而过；德语世界有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的研究，代表作为梅耶尔的《列斐伏尔：一个浪漫的革命者》（Kurt Meyer, *Henri Lefebvre: Ein Romantischer Revolutionaer*, 1973），T. 克莱因斯芬的《被排斥的日常生活：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T. Klienspehn, *Der Verdraengte Alltag: Henri Lefebvre's marxistisch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 Giessen: Focus Verlag, 1975），霍斯特·缪勒的《实践与希望：从马克思到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实践研究》（Horst Muller, *Praxis und Hoffnung: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gesellschaftlicher Praxis von Marx bis Bloch und Lefebvre*. Bochum: Germinal Berlag, 1986）。法语学界出了一本列斐伏尔的传记：雷米·埃斯的《列斐伏尔的百年传奇生涯》（R. Hess, *Henri Lefebvre et l'aventure du siecle*. Paris: Editions A.M. Metailie, 1988）。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等学界有其译著出版。

第三阶段，90 年代以来重新受到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著作的译介开始多起来，关注重点是其 60 年代以来的著作，尤其是以《空间的生产》为代表的空间批判方面的著作。目前，列斐伏尔的著作已经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

但他的大部分著作和手稿还束之高阁。直到现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的影响依然热度不减。估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热度仍会保持,因为空间问题始终还是个重要而突出的社会问题。

2.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总体研究情况 在法语学界,列斐伏尔是最早介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作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他的作品淡出学界视野,1991年他逝世后,法国再也没有关于他作品的任何言论。1994年,受《空间的生产》英文译本出版的影响,《空间与社会》杂志出了一期特刊——《关于亨利·列斐伏尔的新闻》^[11],但这并不足以使他的著作引起法语学界的关注。随着塞勒普斯(édition Syllepse)等出版社出版、再版列斐伏尔的著作,以及他以空间和城市问题为主题的著作在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等学界的广泛传播,列斐伏尔在21世纪初才又重新受到法语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此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城市社会学家,他的城市、空间问题方面的著作是再版最多的。雷米·埃斯(Rémi Hess)在积极推介列斐伏尔著作的过程中表示,“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当今的读者通过阅读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的作品而形成自己的观点。”^[12]

在英语学界,随着《空间的生产》英文版的出版,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受到关注。爱德华·索亚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认为,列斐伏尔“也许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最不被了解和最被误解的”,但他却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的主要来源”。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引发了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吉登斯、哈维和詹姆逊等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问题研究。并且,直至今日列斐伏尔都是“富有原创性和首屈一指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13]。在《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索亚对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化的辩证法“不断地要求人们改变对于空间、时间和存在;地理、历史和社会;空间的生产、历史的创造,以及社会关系和实践意识的构建的看法。列斐伏尔们的‘断言’是发展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的关键时刻,将成为后世著述中引经据典的依据”。^[14]R. 谢尔兹(Rob Shields)的《列斐伏尔,爱与斗争:空间的辩证法》(*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1999年)、斯图亚特·埃尔顿(Stuart Elden)的《理解亨利·列斐伏尔:理论与可能》(*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2004年)、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的《列斐伏尔:一种批评性介绍》(*Henri Lefebv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006年)等是研究列斐伏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都有专门章节评介其空间批判理论。此外,K. 古尼瓦德纳(Kanishka Goonewardena)等编著的论文集《空间、差异、日常生活——阅读列斐伏尔》(*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2008年)中也收录了多篇较有价值的研究其空间批判理论的文章。

在德语学界,梅耶尔(Kurt Meyer)是最早推介列斐伏尔著作的学者之一,在出版了《列斐伏尔:一个浪漫的革命者》(*Henri Lefebvre: Ein Romantischer Revolution-*

aer) (1973 年) 之后, 他新近又出版了《从国家到城市》(*Von der Stadt zur urbanen Gesellschaft: Jacob Burckhardt und Henri Lefebvre*) (2007 年)。近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还有 C. 施密特 (Christian Schmid) 的《城市、空间和社会: 列斐伏尔与空间的生产》(*Stadt, Raum und Gesellschaft: Henri Lefebvre und die Produktion des Raumes*) (2005 年)。

另外, 西班牙语、瑞典语、日语学界对列斐伏尔著作的译介曾一度领先于英语世界, 近十年也不断有其著作再版和新译著出版, 尤其是《空间的生产》等空间批判理论著作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波兰、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东欧地区,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方面的著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 西方学界研究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的专著大多还是把他的理论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空间、都市等主题分别阐述, 并且各个分别阐述的章节都可以作为不相关的主题单独阅读。关于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 还处于评介阶段。

3.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问题研究的共同点和分歧 西方学界认为列斐伏尔相对于其他学者有更为系统和完整的空间批判理论。他们大多从《空间的生产》出发来阐释列斐伏尔的空间观, 认为他在考察空间的哲学历史基础上, 提出了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 每个社会都生产属于自己的空间, 空间是“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的三位一体, 必须对物质领域 (自然界)、精神领域 (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 以及社会领域进行统一性的理论阐述。他们认为, 列斐伏尔强调在 20 世纪, 人们应从对空间中物的关注转向对空间生产的关注, 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社会空间的生产, 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并且, 列斐伏尔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得以续存以及新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西方学界在对《空间的生产》一书内容的评介上没有太大分歧, 但由于受理论传统、关注重点、语言和学科等方面的影响, 学者们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存在较大差异。

(1) 关于空间批判理论的缘起

埃斯认为,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都市问题的研究成果是他在南泰尔学院驻留期间 (大约为 1966~1973 年) 的产物。1968 年出版的《都市的权利》是列斐伏尔进入该研究领域的“宣言”, 1974 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空间问题一系列著作的“压卷之作”。^[15]

索亚认为,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化的形成主要在法语国家。法国有异乎寻常的空间论传统。列斐伏尔是 20 世纪法国空间论的代表人物,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屈一指的空间理论学家”。根据一些近年陆续发表的访谈资料, 索亚同意埃斯的观点, 认为列斐伏尔对于空间问题最初的研究与他那段时间的工作、生活经历以及法国城市规划的社会政治实践崛起的独特社会现象有关。但索亚进一步指出,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都市”、“空间”、“重复与差异”是一系列近似的主题, 正是在这些近似的主题研究

中,促进了空间问题更加明确的理论化。^[16]随着更多列斐伏尔著作英译本问世,英语学界有的学者把2004年出版的《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看作《空间的生产》的画龙点睛之笔,认为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列斐伏尔又开始通过节奏分析概念重新思考空间和日常生活问题。^[17]

与埃斯和索亚认为的空间问题起源于列斐伏尔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和生活经历不同,哈维在《空间的生产》英文版后记中指出,都市化和空间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主题。在60年代,尤其是经历1968年事件之后,列斐伏尔才开始认识到日常生活的都市环境的重要意义。南泰尔学院的学生运动和巴黎城市中的巷战促使他开始思考政治斗争在都市空间展开的问题,但随着对都市问题研究的深入,列斐伏尔认为都市将被都市化过程,或者说将被空间的生产过程所取代。正是空间的生产这一过程使全球和地方、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连接起来。因此,哈维断言,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列斐伏尔才在空间的生产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背景中重新阐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的政治学。^[18]

(2) 关于是否存在“空间化转向”和对空间批判理论的评价

西方学界目前一致认为列斐伏尔是从1968年之后才集中精力进行都市化的本质和空间的生产问题研究的,并且《空间的生产》是这一系列著作中的巅峰之作。但是,由于受列斐伏尔著作、译著出版情况和语言、专业的限制,西方学界还是在各自的兴奋点上解读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关于这一系列著作在列斐伏尔整个学术生涯中的地位,以及他的研究工作是否存在“空间化转向”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

在法语学界,列斐伏尔因《被神秘化的意识》等著作而在20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异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的先驱,是把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引入法国并影响了一代法国学者的思想家。而《空间的生产》在法语世界却是他鲜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并且受列斐伏尔的权威传记作者埃斯的影响,仅把他的空间批判理论归为都市社会学著作,认为这一系列著作只是一个时期内相对独立的研究成果,在这段时期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出版关于都市的著作。^[19]也就是说,法语学界把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完全与他的其他著作割裂开来,认为在他的理论中存在“空间化转向”,空间问题是**乡村-都市社会学研究**的总结,但这一转向只是列斐伏尔学术生涯中昙花一现的小插曲。

在英语学界,列斐伏尔只有《马克思的社会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两部马克思主义专著译成英文,他的《被神秘化的意识》以及美学专题著作等作品没有英文译本,而《空间的生产》却广为人知。因此,英语学界的地理学家、城市学家、文化批判理论家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都把列斐伏尔视作自己领域中的学者。虽然索亚等学者认识到了他的空间批判理论与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密切相关的,但他们还是倾向于把以《空间的生产》为代表的这一系列著作独立看待,过分凸显了空间批判理论的地位和价值,强调它的后现代地理学血统,是开启了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随着研究的深入,英语学界已经认识到列斐伏尔各个时期和主题的著作之间是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的,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计划,而是他思考历史问

题的新视域。埃尔登认为他的思想受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影响也比较大,《空间的生产》实际上是用一种非目的论的辩证法来阐明空间问题。埃尔登强调,列斐伏尔并没有以空间性分析来取代时间性分析,而是将时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20]也就是说,他始终是一个孜孜不倦寻求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国家解放可能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3) 关于列斐伏尔“社会空间化”的“三重性辩证法”研究

西方学界认为,列斐伏尔在其全部著作中形成的独特的辩证方法是其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列斐伏尔自己认为,他的辩证法是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和尼采有关艺术、诗歌、音乐、戏剧的思想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批判。^[21]正是这个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被列斐伏尔应用于空间的生产、节奏分析等领域的“三重性辩证法”至今仍使学界迷惑不已,存在各种解读甚至是误读。

谢尔兹认为,列斐伏尔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由时间转变为空间。他提出了“社会空间化”(socialspatialisation)的先验概念,认为列斐伏尔的实践、认知和想象空间是“社会空间化”的辩证性综合的各个元素。他认为通常把列斐伏尔的“三重性辩证法”演绎为肯定(“日常实践和感知能力”) - 否定(“分析理论和惯例”) - 否定(“全部生活时刻”)相平行的“三个方面的辩证法”的理解令人困惑。他主张辩证法的第三个方面应该被看作否定之否定而不是与前两个处于同等地位的方面。因此,谢尔兹把列斐伏尔的“三重性辩证法”又重新还原为黑格尔式的肯定(日常实践和感知能力) - 否定(分析理论和惯例) - 否定之否定(全部生活时刻将两者全都颠覆)。^[22]

埃尔登批判谢尔兹把列斐伏尔的“三重性辩证法”降低为“空间的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列斐伏尔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变化图景所持有的线性论目的论的倾向,他的辩证法更多是转译了尼采的“超越”而不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扬弃”,以此来阐明空间的生产。^[23]

施密特在阐明列斐伏尔辩证法理论时,批判了索亚在空间生产的三重性维度之外构建了三种独立存在的空间。他认为,索亚把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作为独立的空間来看待,并强调社会空间的战略重要性,把其称作“第三空间”。对于索亚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空间、一个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再现性空间(a lived space of representation),并认为所有空间都可以通过第三空间被理解和改变。此外,索亚还宣扬一种“具体空间的认识论”,用来分别审视第一空间(物质空间)、第二空间(精神空间)甚至是第三空间(社会空间),并把这种认识论应用于《后大都市》一书中,把不同的城市研究方法区分为三个基本的种类。施密特认为,列斐伏尔绝不是要区分第一、第二、第三这种等级性的空间,而是强调空间性生产的辩证性和相互联系的特征。他强调,“空间生产的三重性应该被理解为具有同等价值的根本性存在,这三重维度哪个也不是本源性的‘命题’,哪个也不具有优先性。空间是未完成的,它被持续地生产,并且它总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24]

在当今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在西方学界尤其是英语学界又恢复了生机。但研究规模不大,总体上还处于知者甚多、解者尚少的阶段,还

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文本的深入解读以及与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著作的关联研究。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者大多把列斐伏尔哲学思想划分为不同主题分别加以介绍和研究，对空间批判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还处于个别著作的评介阶段，研究规模也比较小，基本是在城市社会学、批判理论等各专业领域内的专门研究，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和列斐伏尔著作的逐渐出版、再版和译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其各个主题的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应该系统地加以研究。

三 本书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

（一）本书的基本观点

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列斐伏尔的理论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空间批判和节奏分析都是这一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不断深化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批判思想。

第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展示了 20 世纪现代性的空间实践逻辑，深刻揭示了日常生活异化的机制。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生产及其都市化战略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全面被规划和普遍异化，从而被规划的日常生活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深层的和微观的基础。

第三，节奏分析又进一步深化了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批判的现代性批判主题。空间生产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操控和对日常生活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借助多种单调的、线性重复的社会生活节奏及其各种微观权力编织而成的社会空间，即都市化战略而实现的，这种单调的线性的社会节奏压倒周期循环性的自然节奏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主要节奏，并且内化到现代人的生存结构之中，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日常生活异化的深度。

第四，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进”。列斐伏尔通过在商品、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范畴基础上，引入空间、空间的生产、国家、都市、日常生活、时间、节奏等概念，构建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的三元解释模式，丰富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

第五，就哲学范式而言，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是一种文化批判。作为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对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理性文化危机以及人的文化困境所作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既有对理性主义文化的激进解构，也有对重建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文化的呼吁；既有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也有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变革措施。

第六,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尽管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局限性不仅表现在他的空间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战后全盛的福特主义时期进行的分析和批判,必然要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还表现在以空间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必然会因为凸显空间要素而遮蔽资本主义社会其他结构性要素,以及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重新阐释在多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推进和发展也是有待商榷的,而且他的革命策略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无论如何,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的理论谱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他的理论再一次提醒我们,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揭示处于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的东西,辩证地考察具体社会历史现实并随时代不断发展。

(二)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

为了充分展示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的理论全貌,揭示空间批判在其学术生涯中的地位以及与日常生活和其他研究主题之间的深刻关联,本书选取了列斐伏尔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 6 部主要著作的英文版、2 部著作的中文版和列斐伏尔著作、论文的 2 部英文合集等作为研究基础。它们是:《现代性导论》(1962 年)、《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 年)、《空间与政治》(1972 年)、《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 年)、《空间的生产》(1974)、《论国家之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从黑格尔到毛泽东》(1976 年)、《日常生活批判 III: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1981 年)、《节奏分析要素:节奏知识导论》(1992 年),以及斯图亚特·埃尔登等选编的《列斐伏尔主要作品选》(2003 年)和《国家、空间与世界:列斐伏尔论文集》(2009 年)等。立足于对这些本书的深入解读,本书力求准确把握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所作的富有创见性的分析,深刻理解列斐伏尔通过在马克思经典范畴基础上重新引入空间、空间的生产、国家、都市、日常生活、时间、节奏等概念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所作的努力,全方位、贯通式地展示这一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交融的独特理论。

在具体的研究中,本书主要运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本书围绕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研究,审视其空间理论展开的思想视域和背景,勾勒其空间分析的逻辑进路和方法,挖掘其空间批判的内涵和旨归,从而绘制出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发展相适应的空间理论“体系”。二是比较分析法。这种方法是人物研究中常用的技术方法。本书在对列斐伏尔思想全景和理论分期的分析基础上,指出空间批判理论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的思想史定位,并将空间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进行横向比较,彰显其在对重大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分析中的独特思想魅力和理论价值。

本书在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中研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对列斐伏尔关于空

间概念的内涵、空间生产的宏观战略和微观机制、空间的矛盾性和总体性的空间革命的阐释中理清列斐伏尔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空间分析的叙事谱系和思想脉络，揭示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关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性解释；从列斐伏尔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反观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分析马克思社会历史思想的时间性特征，挖掘其蕴含的空间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反思列斐伏尔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进”；从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出发，将空间批判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中，分析其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点和差异。根据这种理论运思，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关于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研究现状和本书的基本立场、方法与写作框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是对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的理论视域和方法所作的总体说明。第三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对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和逻辑进路的阐释和分析。第四部分为第六章，是从比较视域出发，对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异同所作的反思。第五部分为结语，是对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所作的简要概括和评价。

第一章分析了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理论缘起，阐释了空间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批判视域和方法论支撑。从现代性批判视域出发，在简要介绍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本书论证了列斐伏尔空间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并通过对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思想的重新审视，试图揭示列斐伏尔三元辩证的空间分析是对这三位伟大思想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章是对列斐伏尔空间概念的解读。空间是列斐伏尔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核心范畴，列斐伏尔为什么选择空间作为其研究对象，这取决于他对空间的理解。本书试图通过对空间概念历史演变的批判性分析，对列斐伏尔关于空间与自然、身体关系的阐释以及他以城市变迁为线索从微观层面绘制的空间化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勾画出作为具体的总体的空间概念。

第三章是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微观机制的解读。列斐伏尔之所以展开空间分析，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得以续存和发展依赖于空间的生产，作为整体的空间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由此，文本的解读试图理清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战略的空间生产的微观机制。具体来说，空间是政治统治的工具，空间的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国家和政治权力通过都市化和日常生活被规划的微观机制来实现抽象空间的生产。

第四章是对列斐伏尔空间矛盾性和空间革命思想的解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把自身扩展到作为整体的空间中从而实现了它的运行，同时也正因如此，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使自身的矛盾在空间层面得以现实化。抽象空间的矛盾性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同时也为革命和新空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由此，本书试图从质与量的矛盾、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为生产性消费而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与为非生产性消费而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暂时与稳定之间的矛盾、都市化背景下“中

心—边缘”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本质性矛盾——空间的私人占有与作为整体的抽象空间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分析出发，展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矛盾性，并通过对革命的内涵、目标、决定因素和可替代方案的阐释揭示列斐伏尔的总体性革命理想。

第五章是对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解读。在空间分析中，列斐伏尔已经察觉到把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完全归于空间的生产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国家和政治权力掌控下的空间问题其实与时间问题密切相关。在生命的最后，他以节奏分析来对空间生产的阐释作最后的润笔。由此，本书试图从节奏概念和节奏分析方法的内涵分析、时间的线性重复与空间的节奏化组织、线性重复的微观生产机制及其反抗途径等方面，阐释其节奏分析理论的完整内涵。

第六章是对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思想的对比研究。在对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从研究主题、研究范式、理论特质等方面论证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异同，并着重分析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历史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而试图展示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独特性。

结语是对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的一个简短的评论。

[1]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第7页。

[2]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导论第1页。

[3]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5] 关于列斐伏尔的生平介绍可参照衣俊卿的《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和刘怀玉的《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等著作，本书在此不作赘述。

[6] 〔美〕爱德华·索杰：《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34页。

[7]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pp.59-60.

[8]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I,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With a Preface by Michel Trebits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reface xix.

[9] 转引自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I,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With a Preface by Michel Trebits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reface xx.

[10] E.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p.42.

[11] Coornaert and Jean-Pierre Garnier, “Espaces et sociétés” n. 76, (1994) .

[12] Rémi Hess, “Présentation de la troisième édition”. Du rural à l’urbain. Paris. Anthropos. 3^{ème} édition, 2001 [1970] . (V-XX-VI, VI) .

[13] E.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pp.41-42.

[14] E.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p.51.

[15] 转引自〔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第2页。

[16] E.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pp.49-51.

[17]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vii-ix.

[1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p.430-431.

[19] 转引自〔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第2页。

[20]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37.

[2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406.

[22]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36-39.

[23]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37.

[24] Edited by Kanishka Goonewardena, Stefan Kipfer, Richard Milgrom, Christian Schmid. *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8, p.43.

第一章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的理论视域与方法

众所周知，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闻名于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他被认为是与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并驾齐驱的社会批判理论大师。在“后 68”时代西方左翼纷纷倒戈“向右转”、马克思主义面临理论危机的艰难岁月里，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世人物中最老的幸存者”^[1]，在年逾七十之际，继续坚持在马克思的经典问题域内思考都市问题和从事空间研究。以《空间的生产》为代表的空间批判理论使他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思想界“杰出的例外”，被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誉为 20 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经典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富有原创精神的批判性分析，继续坚持对马克思理论的独立理解和解释，进一步发扬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分析中使马克思主义大放异彩，并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那么，列斐伏尔为什么选择空间作为其研究对象？空间分析与现代性批判是否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他的空间分析体现怎样的方法论特征？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章的研究内容。

第一节 理论缘起：理论危机与现实契机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而恰恰是拯救西方马克思主义于危机中的不屈努力。从列斐伏尔自身的思想发展来看，空间批判不是与日常生活批判无关或并行的另一条理论线索，而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一种理论深化。当然，任何理论的生长都离不开社会历史现实的土壤，理论的运思把握的是时代的脉搏。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切关注，更是对他所生活时代的深刻阐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

一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2]的传统及其危机

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或思潮，而是伴随着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相继登场、异彩纷呈的理论景观。无论是人本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出发，通过与同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学说的交汇或交锋来重建马克思主义，还是从马克思的成熟著作出发，以结构主义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重建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都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 20 世纪人类文化和历史的新的背景下，对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和人类生存的文化境遇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无疑，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复兴。并且，我们可以透过表面的差异和纷争窥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理论特征和思想传统。首先，从理论研究的着重点来看，与马克思本人的学术重心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好相反，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露怯，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得到了复兴。其次，从理论的形成来看，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都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遗产，比如黑格尔、康德等人的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撑，并在对同时代的各种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借鉴下，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文化进行批判。共同的理论特征使得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以文化批判取代经济分析和政治战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创造了根植于现代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佩里·安德森这样描述这个光辉而丰富多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最突出的是，艺术和意识形态是这个传统的相当大的特权领地，一个接一个的思想家在这个领域里以历史唯物主义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和严谨研究而名声显赫。”^[3]

然而，正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术传统及其理论特征暴露出其走向低迷和面临危机的致命弱点。一是“理论的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甚至是过度膨胀无法弥补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的匮乏。从经济分析上来看，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几乎没有人回到成熟的马克思所关注的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基本问题上，因而，也就没有人能达到卢森堡和希法亭等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从政治实践的探讨上来说，在葛兰西之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再也没有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性质展开系统的讨论，也就没能再形成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性的政治战略。二是“战略的贫困”。一方面，战略的贫困是理论贫困的必然结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复兴使理论成为“密码式的语言”，缺乏富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政治战略的探讨。另一方面，战略的贫困和理论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相脱离的现实境遇。作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要么被流放，要么在狱中逝世，理论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联系被切断了。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了学院和书斋中。尽管理论家们

关注现实，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但远离直接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的结果使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徒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却缺乏改变世界的策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却难以担当“消灭哲学”的重任。

终于，理论与现实政治实践相脱离导致的“理论的贫困”和“战略的贫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声势浩大、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中暴露无遗。这场文化反叛运动和西方资本主义向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迈进的步调相一致，因为，以经济进步和技术标准为最高准则的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经历的危机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正因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和人的生存状态入木三分的分析，使得马尔库塞、萨特等人成了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统统拒绝的“大拒绝”战略激发着学生和其他社会群体建立新世界的梦想，引领着这场革命的狂欢。然而，也同样是因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革命主张注定了这场学生运动倏然而逝的命运。马尔库塞等人提出的革命策略是一种持久的文化革命，缺乏短时间内穿越机构和体制壁垒的政治斗争策略。加之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具有领导革命的政治地位，无法使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相结合，因而，尽管学生运动拒绝一切形式的社会异化现象，反对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度和组织结构，要求实现民主和自我管理，但却无法通过政治斗争为这些美好的设想寻找现实的出路。“在大学校园里和街垒中与警察的搏斗，不是战斗，而是萨特存在主义式的‘自我实现’的场所，学生们所看重的，只是保证人们的反叛精力有所出路，战斗精神有用武之地。‘大拒绝’之后怎么办？如何获得稳固长远的胜利？这些问题，学生大众根本不予考虑。这种‘革命’，狂欢的色彩十分浓厚，已经失去了现实政治的意义。”^[4]

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但以理性主义文化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思想家们开始更深入地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这一时期，以福柯、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更是从全新的理论和政治视角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变化，以微观理论和微观政治对传统批判理论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与后现代理论的兴起相反，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衰落。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在 60 年代之后主要走向了审美沉思，“人们可以看到实实在在过度膨胀的美学研究——它在生动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衰退了的地方，过度承载了所有受压制或否定的价值观：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和当前的道德准则，为过度的艺术沉思所取代。”^[5]伴随着阿多诺、卢卡奇、马尔库塞、萨特等人的相继谢世，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告一段落。然而，作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唯一的幸存者，列斐伏尔却是个例外。他的思想轨迹始终紧随社会现实的变化，始终关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历史变迁。在资本主义经历的从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 30 年黄金发展时期，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也从战后初期对日常生活的哲学反思深入到在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微观分析。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对城市和乡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到 70 年代形成的空间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同时期发展的社会现实的理论再现，也是对全球性学生运动和革命形势

变化的反思，对文化革命的困境和提出的问题的回应。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到都市社会的转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所凸显出来的空间问题的研究，不仅没有承袭走向审美沉思的理论传统，反而是从其他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忽视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问题和范畴出发，对当前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和总体特征作了深入分析，对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策略等展开了积极探讨。

二 都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研究

列斐伏尔选择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是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理论危机之时，为了重新寻找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忽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重建。即便是在列斐伏尔本人日常生活批判的学术生涯和理论思考中，空间分析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海德格尔那里，空间是生存在世界中的一个方面，即生存的空间性规定。列斐伏尔也认为空间本身就是构成日常生活的一种本质规定性，日常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时间和空间都是对日常的活生生的生命经验的内在维度。在对他的思想出现空间转向以及这种转向何时出现的质疑声中，列斐伏尔本人是这样回应的、“那些支持我的人十分惊奇，我是何时开始投身于诸如建筑、城市问题、空间组织等问题研究的……我自孩提时代起就开始了空间研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哲学要区分主体与客体、身体与世界，它们间的界限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分明。内部世界不也是一个宇宙吗？精神与空间正在分裂欧洲哲学……我蜿蜒前进……通过马克思的思想……我开始走到空间问题面前。”^[6]通过马克思的思想，列斐伏尔启动了贯穿其一生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规划，作为日常生活本质规定性的空间性又通过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成为他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列斐伏尔的思想中并不存在空间转向，空间批判实际上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进行的日常生活研究。接下来，本书将对列斐伏尔从早期的日常生活研究到之后的空间批判的思想轨迹作简要的阐述。

作为与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齐名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的早期思想也是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总体的人的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1939年）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被视为里程碑式的著作。然而，列斐伏尔并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研究的传统中。以日常生活研究为视角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影响，但更体现了列斐伏尔想把哲学与活生生的现实性连接在一起的欲望。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围绕异化概念及其辩证性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关于实践活动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表现为“一系列概念及其发展的集合的那种哲学”，哲学家应该把目光“投入到关于人类的原材料中去”。于是，《日常生活

批判 I：导论》（1947 年）诞生了。从此，揭示人类生存的现实性的日常生活批判成了列斐伏尔进行哲学研究的新方向，日常生活批判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异化现象和问题研究的突破口。列斐伏尔在同名著作的第三卷的导论中曾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研究：“这个‘精心之作’既没有发明词语也没有创造事物，但克服了‘哲学—非哲学’、‘重要的—不重要的’、‘无知—知识’之间的界限。”^[7]当然，在第一卷中，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还带有自由的乐观主义情绪。他提出，进行日常生活研究就是要帮助人们“把握这些关于人类的材料”，“剥去泥土的外衣而揭露出珍宝的本来面目”^[8]。在他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被异化了的现代日常生活与这种巨大社会变迁之前传统日常生活中隐藏着的具有丰富性和意义的本真生活方式日益背道而驰，但日常生活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个单调重复的线性过程，在异化的现代日常生活中还有特定的统一被坚持着，表面的贫乏之下隐匿着难以被察觉的财富。**对列斐伏尔来说，节日和节庆的狂欢就是具有异质性并能重塑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时刻。他坚信，日常生活最终会因为人的去异化而变成理想的生存体验。**在第一卷当中，列斐伏尔还仅仅是初步提出了日常生活不应该在哲学家的视野之外，日常生活研究与对社会异化的理论分析直接相关，还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内部，“从一开始，日常生活批判透露异化的内容，但不会精确地解释它的地位，无论是哲学的、科学的甚至隐喻的！理解生活经验，正确放置它，在动态的概念星群中恢复它；通过陈述它所包含的而‘解释’它——这是这本著作和计划的意义的表达。”^[9]伴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兴起，列斐伏尔很快意识到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过时了。

列斐伏尔不是一个书斋型的理论家，随着他的身体和生活经验不断地游走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他的研究主题和思想流变也呈现丰富多彩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样貌。他经常回到比利牛斯山的乡村，“正是法国比利牛斯山脉发展不均衡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了视觉的和理论的‘契机’，这些契机唤起了他对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批判性解释。”^[10]当然，不仅仅在比利牛斯山，列斐伏尔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曾经周游世界，见证世界各地城市的诞生，体验城市如何打破传统乡村生活的社会变迁。正是在从传统的乡村生活到正在建立的都市生活的巨大变迁中，列斐伏尔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丰富的实例和夯实的社会学研究为他提供了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日常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也正是通过城市和乡村问题的研究，列斐伏尔发现，日常生活一方面与现代性互为表里，日益成为现代性这幕怪诞剧的“场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与现代性相抗衡，具有反抗现代性的潜能。因此，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批判已经深入到了对新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中。《日常生活批判 II：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等完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著作揭示了在 1946 年之后十多年时间里日常生活日益贫乏、受动和被规划的变化，并指出了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征服农业和历史城镇的产物，资本主义再一次充当了殖民者的角色，但这一时期殖民的对象是日常生活和文化。受列斐伏尔著作和思想的鼓舞，现实中的 1968 年学生运动也扛起了“改变生活”、“改变生活的被雇佣”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然而，此时期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并没有

分析日常生活被操控的原因和如何被规划的问题，也没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根本机制所在，更无法提出改变生活的具体的反抗路线和目标。因此，反抗力量从理论中获得的仅仅是对“改变生活”这个当务之急的认同，无法以更具有现实性的政治行动进行革命斗争。

在对现实运动的失败和理论瓶颈的思考中，一方面，列斐伏尔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去寻求批判理论与现实相连的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 19 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日常生活异化的思考以劳动概念为核心，根植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他直面社会现实历史进程，探究新资本主义城市规划实践背后深层的社会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列斐伏尔发现，全球性的城市建设和都市化现象与社会空间的生产活动紧密相关。**都市化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战略和社会实践的兴起，使空间的工具性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凸显出来。正如索亚所说：“隐藏于正在成形的现代性里的，是一种深刻的‘空间性的权宜之计’。”**^[11]关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对列斐伏尔的影响，以及列斐伏尔对 20 世纪 50~70 年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再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分析将在本书探讨资本主义的生存与空间的生产（第三章）中详细阐释。总之，他意识到，进一步深化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性研究要像马克思那样，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揭示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存续和发展中的地位，从而才能阐明日常生活被规划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如何做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看，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现代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与现实历史进程的统一上来看，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都市化战略和城市建设的实践进行的深刻反思。从列斐伏尔自身理论的发展来看，空间批判理论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进一步深化。

第二节 理论视域：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化，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显然更为深刻、清晰，但争议始终不断。列斐伏尔对现代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就指出，当今时代迫切需要关于现代性的理论，“构建现代性理论势在必行”^[12]。斯塔西斯·库维拉基斯（Stathis Kouvelakis）认为，列斐伏尔于 1962 年出版的《现代性导论》是其对现代性这个并不是他创造的概念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作品，并且，这一理论贡献使现代性成为列斐伏尔理论谱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概念。^[13]列斐伏尔在 60 年代之后关于城市和空间研究所阐释的正是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换句话说，列斐伏尔对现代性的独特研究是系统地探究了城市与空间问题，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对社会的都市化改造和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一 现代性的定位与划界

由于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研究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阐释呈现多视角性，“现代性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露出其清晰的地平线，依旧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冲突的、相互关联又纠缠不清的‘星丛’。”^[14]从不同学科领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来说，哲学侧重于在理性文化精神层面反思现代性；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主要从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层面思考现代性；文学和艺术则主要从审美经验出发具象地阐发或先锋式地表达着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从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来看，人们对现代性也存在多种多样的理解。作为一个与时间相关联的历史性概念，现代性代表与过去断裂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一种“当前性”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黑格尔把现代作为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吉登斯把现代性问题的出现追溯至17世纪的欧洲。他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现代性正内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福柯对这种历史性的现代性概念这样总结道：“人们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15]这些不同的主张共同揭示出了“现代性”的双重维度：时间性和结构性。“现代”既是一个与时间相关联的历时性概念，又是一个非时间性的共时性概念。一方面，“现代”表示能够使自身通过反思成为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另一方面，“现代”一词既然有历史谱系可寻就意味着它具有稳定的结构特征，可以与其他社会加以比较。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个人从等级和地域的限制中摆脱出来，世俗化的生活摆脱了宗教的压迫，自由创造的科学理性精神得到了解放，工业和贸易扩大了人的普遍交往，在平等和民主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奠定了新的社会秩序。与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相适应，现代性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意识，它崇尚理性，相信人能够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实现进步和世俗幸福。正像沃勒斯坦所言：“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它取代甚至埋葬了另一种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组合，我们把它称之为旧秩序，它的确极为陈旧。毫无疑问，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些新的现实和新的世界抱有同样的反应。有人欢呼，有人反对，还有人不知所措。但几乎无人不晓发生变化的程度。”^[16]

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来看，我们同样可以窥见现代性的多副面孔。黑格尔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却是现代性问题研究不可绕过的思想家。在他那里，启蒙运动意味着“现代”的到来，因为，在这个时代，理性成为“世界的主宰”。但是，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私人生活得到承认之时，也使得这个社会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人私利的角斗场”，而且这个市民社会的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更进一步表现为私人利益和国家代

表的普遍利益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国家，因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是一切社会矛盾调和的最后保证。国家是“伦理的整体，自由的实现”。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保证市民社会的秩序，而不是相反。因此，现代性既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具有人类学意味，同时也是国家的实现，具有政治内涵，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中的现代社会认识，他指出，现代社会的矛盾并不是私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背后存在的是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矛盾，而现代国家也不会是调和矛盾的关键力量，因为国家只是阶级利益的表现。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完全没有认识到现代劳动的矛盾和分裂这一实质问题。在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基础上，马克思勾勒了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把现代性看成是内涵于资本逻辑之中的必然产物。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规定了现代社会始终处于不可解决、不断加剧和不可调和的自我矛盾中。正因为如此，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永恒性，它只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被超越的阶段。显然，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历史性和矛盾性对现代性的多维透视直接击中了现代性的本质，揭示了现代性的丰富内涵。马克斯·韦伯无疑也是对现代性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之一。他主要从精神文化层面揭示现代性的理性内涵。韦伯认为，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关联，现代性是世界不断“祛魅”，即理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两种逻辑：一是文化的理性化；二是社会制度的理性化。第一种逻辑导致的后果是社会绝对价值的坍塌以及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相互冲突。第二种逻辑导致的后果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以及前者日益起支配作用。总之，理性化的后果便是难以避免并可能日益加重的冲突和矛盾。

无论现代性呈现怎样多样性的面貌，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具有本质关联，代表着渗透到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本质规定性。现代性阐释的多重帷幕背后是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和运行模式的关注与反思。综观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阐释的各种观点，可以看到，“现代性是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内在的理性的文化模式和运行机理。”^[17]具体来说：第一，现代性大体上是指启蒙运动之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组织模式。固然，现代性不可能一跃而现，它必然与前现代紧紧纠缠在一起。但由于启蒙运动奠定了与前现代社会有着根本区别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基调，因此现代性可追溯至启蒙运动时代。既然现代性有“始”，也就必然有“终”，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性无非只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特殊阶段。第二，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有深刻的关联，毋宁说，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现代性相信：人具有理性能力，这种能力是可靠的、富有创造性的，人们可凭借理性的强大力量征服自然、改造世界、改进技术，实现人类的不断进步，最终实现梦寐以求的自由。现代性所内含的理性主义支配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经济结构到政治组织，从社会日常生活到观念意识形态，从社会实践到理论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性从本质上是文化存在，是理性化和个体化时代的主导性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18]第三，现代性具有“自反性”特征。每个时代都具有自

我分裂的可能性，只不过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前现代不知不觉地在为即将埋葬自己的现代性做准备。而现代性在把前现代重重甩在一边时，却忘记了前现代的命运也是它自己的。当现代性的实践者还沉浸于自己唯心主义地编织出来的美丽梦想时，历史进程中正在萌发着重重“反现代”的因素：非理性主义的狂热、理性的异化、反人类能力的增长等。这些因素迟早有一天会打破现代性的美梦。20 世纪的种种灾难表明，现代性所坚信的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是人类的不断进步这一念想只是过度的乐观主义而已。现代性以无与伦比的理性精神建造了现代工厂体系，同样的理性精神也制造了奥斯威辛的悲剧。现代性既生产商品和财富，也生产罪恶和死亡。现代性既让人们“物质富裕”，又让人们空前地感到“精神痛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详细说明了启蒙在驱除神话的同时是如何最终退化为“神话”的。第四，“现代性是具体的”。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性是由“同一性”逻辑绝对支配着的历史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只是某种在观念中想象的统一体，它在现实社会历史中是“非中心的、弥散的、微观的、内在机理性的异质的存在现象”。也就是说，现代性既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现代世界中获得了最细致的表现。总的来说，“现代性在历时的维度上并不呈现为一个线性决定的必然的历史进程，更不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唯一的、必然的路径，而是多种历史文化要素和多种社会力量在多种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场域中相互冲突、交汇、纠缠、选择、借鉴、学习、模仿、生产、建构的复杂多样的、多重的、多维的、多岔路的历史运动过程，是多种现代性要素的不同轨迹交叉、交织又充满张力和离散力的过程。”^[19]

二 列斐伏尔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诉求

马克思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总体性实践呈缺席状态，人们失去了对现代世界的思考能力。许多思想家的理论不过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作的“注脚”，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社会为“世界”，黑格尔关于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的隐喻一语成谶。列斐伏尔认为，面对现代世界，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接受、排斥或屈从，而是应该勇敢地直面、审慎地观察并加以批判地反思。因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建立 20 世纪的现代性理论极其必要。为此，他考察了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在 19 世纪对现代性作出的理论反思。

列斐伏尔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在 19 世纪 40 年代曾对现代、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作过深入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为重建新世界和新生活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在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现代”一般是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所谓的文明时代，表示“资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的增长、资本主义的建立、他们的政治表现，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批判”^[20]。马克思对现代特征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理解。他认为黑格尔洞察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在现代世界中，政治国家具有抽象性，在这种抽象性中普遍利益得以确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彼此混淆又相互分离。私人

生活、国家和渗入社会实践的普遍抽象是现代的产物，因此，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世界具有“极端的分离、分裂和双重性”特征。基于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表示高于社会的国家的一种形式，也表示这种形式与日常生活和一般社会实践的关系。”^[21]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无疑为人类开启了通向自由的地平线，但在马克思看来，通过分离和抽象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只是表面上的理性统一体，这种现代性形式从与旧世界决裂的一开始便具有毁灭自身的力量。当资产阶级把这种抽象形式作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手段强加于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之上时，资产阶级通过实践许诺的新生活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观念和知识的混合物，是特定人群控制他们生活的手段，是为他们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和通过强力来把这种解决方法强加于其他群体的手段”。^[22]因此，一旦关于新生活的图景变成了意识形态，现代性也就终结了，现代世界将笼罩在现代主义的阴影中。资本主义现代性“像一块硬壳，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实践的缺场和它的失败：革命性实践、总体性实践。现代性暴露这一缺陷。通过阻碍革命的可能性和拙劣地模仿革命，现代性将成为投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阴影”。^[23]进而，马克思提出了重建现代性的主张，即通过革命性的（总体性的）实践创造一个新世界。“革命性的（总体性的）实践将重建真正的统一体：被重新发现、控制、认识和恢复的自然。”^[24]因此，马克思关于新世界的伟大理想是摆脱现代生活的抽象性和双重性，把人类从这种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归人类生活于其中并和谐共生、内蕴无限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自然。

在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概念和重建现代性的计划进行阐释的同时，列斐伏尔也考察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思想。在他看来，尽管也像马克思一样经历了1848年的失败，意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实践并不是真正变革世界的革命性实践，相反，恰恰证明了革命性实践的缺场，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重建却走了一条与马克思的激进批判截然相反的道路。与马克思渴望通过革命性实践来克服现代世界赖以成立的分离从而创造另一个新世界不同，波德莱尔通过现代艺术反抗被异化的日常生活和资产阶级社会，以期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创造一个审美的现代新世界。因此，波德莱尔强调现代性的变动不居和瞬间性。因为，他所接受的充满恐怖、蔑视、嘲弄和不可忍受的真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审美世界的永恒底色，艺术创造出的新世界只是这永恒中的瞬间。如果说，马克思总怀恋被文明撕碎的自然，呼唤统一性，波德莱尔则攻击自然，他认为现代只能存在于抽象的现代文明中，存在于艺术创造中。在列斐伏尔看来，波德莱尔之所以痛苦地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修正，“通过雇用表象和幻想，用词语影响图景和象征，在不可忍受的真实的世界上创造一个还过得去的（观念化的）虚构世界”^[25]，是因为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单面的，因而，他重建现代性的方法必然只能是一种“狭隘的实践”、“嘲弄的实践”。

通过阐释和比较，列斐伏尔意欲强调对现代性不能只作单方面理解，要看到现代性的矛盾性。他完全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抽象性和双重性的理解。而且，他认为，现代性的矛盾性特征需要马克思式的激进的批判，只有总体性实践的方法才

能真正改变世界。因而，列斐伏尔的现代性理论致力于恢复马克思的革命性（总体性）的方法和对新世界、新生活的乌托邦构想。为此，他首先区分了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以及相应的关于新世界图景的意识形态形式和乌托邦主义。列斐伏尔认为，区分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和前提。他把现代性界定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二者既相互对立又混杂在一起。现代主义是一种使相继的时代保持其连续性的意识形态。它具有“自命不凡”和“富于幻想”的特征。现代主义使现代世界不停地变换，却只是流于对时尚的追求和对新奇的模仿，只是对现代世界的外观作出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改变。与之相反，作为现代主义对立面的现代性是“反思进程的开始，是批判和自我批判这种或多或少是进步的尝试，是试图获得知识的努力”。^[26]现代性意味着质疑和批判性反思，意味着真正的变化和非连续性的涌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突变”是现代性的开端。尽管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在列斐伏尔的阐释中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二者却不可分割，因为现代世界正是通过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呈现出矛盾的特征：既过分自信又毫无把握，既傲慢自大又卑微恐惧。其中，确信和傲慢是现代主义的表征，质疑和批判是现代性的特质，它们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世界的复杂面貌。与现代世界的双面性类似，人们心中关于新世界图景的构想也是复杂的。“在任何历史时期，期盼新世界的强烈愿望将是混乱的。意识形态、乌托邦主义、象征和神话不可避免地混杂在有强烈愿望的人们的心里。”其中，“乌托邦图景是可能性的图景，不仅仅是能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的图景。意识形态把自己作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真理；尽管它证明被期望变为现实的改变是合理的，但意识形态没有乌托邦图景有效。”^[27]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主义代表着关于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实证性和可能性的两种对立的趋势。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关于新世界的构想是乌托邦主义的，尽管他提出无产阶级通过总体性革命结束人类的异化状态，但他总是避免预言具体的新世界是什么样的。因为历史的具体细节是不能预见的，因而不能在众多可能性中具体选择哪一种可能性。然而，也正是因为没有实现乌托邦图景的具体路线，没有具体的实践或行为可以保证实现马克思的计划，所以才有了被宣告为解决办法并被强加给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且，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主义在批判思想缺失的当下是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的。

因此，列斐伏尔关于现代性的阐释是要剥去现代主义的外观和幻象来洞察现代性的内核和本质，从而获得关于现代性的完整的概念。相应的，列斐伏尔所谓的目前急需的现代性理论就是对现代世界的危机和混乱进行激进的批判，这种反思性的理论进程要透过现代主义的迷雾去分析现代世界的矛盾性本质，辨识和批判混杂在新世界图景中的意识形态，致力于探索新世界和新生活的乌托邦图景。总之，列斐伏尔要像马克思在 19 世纪所作的努力那样，对 20 世纪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目的是“开启现代世界的可能性领域，展现它的多样性，以及选择的必要性和每一种选择所包含的风险。一句话：揭示现代性的偶然性”。^[28]

三 20 世纪的现代性及其矛盾性

在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交织和更激烈的矛盾运动中，20 世纪的现代世界被撕扯出来，相比于 19 世纪，更具有多样性和无序性。现代性的图景相比于前一段时期更加呈现矛盾性的特征。列斐伏尔正是在具体的现代性意义上，从社会内在的文化精神和运行机理出发阐释 20 世纪的现代性问题的。

首先，20 世纪的现代性诞生于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它与意味着突变和非连续性涌现的革命概念紧密相连。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新生活的期许，每一个时刻都有走进新生活的可能性。进入 20 世纪，世界上不仅发生着以俄罗斯革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同时也发生着审美的和科学的革命。比如，深受阿波利奈尔影响的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文学艺术创新运动，桑德拉尔开创的现代诗歌风格，毕加索开创的印象派画风，以及西方现代绘画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的立体主义运动等。列斐伏尔认为，这一时代的现代性在这样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初露端倪，“它诞生于 20 世纪发生在社会实践领域的相当可观的变革中，伴随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05 年和 1917 年的俄罗斯革命，以及在积累进程中技术的优势地位。”^[29]尤其是在欧洲，它显得悄无声息，因为社会转型并不是以喧腾的暴力革命为序曲，在延续的乐观主义的进步幻象里人们毫无防备地迎来了新的时代。因此，列斐伏尔把 20 世纪现代性的开端确立在社会变革的起点，“在 1905 年左右（为什么是这个日期？因为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日子，是即将开始的时代的象征），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轮廓开始在历史的薄雾中显现出来。”^[30]

其次，解构与自我解构成了这个时代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原则。一方面，现代性开启新生活、许诺新生活。它是对前现代性的解构。在欧洲，现代性主要表现为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出现和应用，比如，电、内燃机、汽车和飞机等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中，人类从未有哪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有如此多的人享受如此多的幸福；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武装力量，国家之间对资源、生产和技术研究的竞争，进而是战争上升到从未有过的程度。人类从未有哪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生活在恐怖之中，经历着种族屠杀、恐怖战争、政治清洗、背井离乡等。从而，现代性的自我解构把世界和生活推向痛苦的深渊。“我们的时代试图消除悲剧，然而同时也越来越深地陷入悲剧。我们的时代是暴力失去控制的时代，同时也不再想要听到强烈的激情，可能是因为拥有的太多已经超出了它所能承受的极限。因为胆怯，它把自己藏在遵从与琐屑之后。它露出微笑作为自己的标志。它尽可能地恢复信心和内在的安宁，崇尚良好的幽默感、精致美好和随和友善，并让友好的微笑作为一面旗帜高高飘扬。”^[31]

再次，因为解构和自我解构的矛盾性内化于 20 世纪的现代性之中，马克思所洞见到的由分离和抽象打造的现代世界的矛盾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被加剧。“分裂、分隔和双重性正恶化并趋于极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日常和高尚、需要和欲望、自然和文化、自然和科技、肉体上的满足和失败、个人活动和社会实践）。另外还可以列出更哲学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清单：存在和思维、意识形态和现实、表象和在场、目的

和手段、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等等。”^[32]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20 世纪现代性的本质矛盾是“分离与整体化”（separation and totalization）的矛盾，“前者发生在个人和他的生活领域，后者通过国家、整体的社会、信息、规范、文化等起作用。”^[33]一方面，现代性的社会实践使个体的私人生活被分割和安排，进而每个个体被孤立和分隔，彼此成为“他者”，生命越来越原子化；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社会实践致力于社会的社会化，建立起了以集中为特点的特大城市，大型的公司、办公场所、军队和政党，等等。因而，“在这，我们见证生命的‘原子化’（被单方面地公开指责了上百次）与过度组织化之间的冲突，过度的组织化把生命禁锢其中，并把要求生命原子化作为前提。”^[34]

因此，列斐伏尔强调，20 世纪现代性的图景是“双面的”，“一方面，加速的技术进步战胜了物质自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进程的快速增长置饱和因素于不顾；社会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关系的相对停滞，包括那些在机构（国家、政府机构等）中工作的人。”^[35]在人类深刻地改变着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同时，人与自身的关系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革，“等级”、“权力”、“异化”关系并没有消失。相反，在以科学和技术开启新生活的一开始就伴随着科学和技术对人的控制和管理。“恶魔”一开始就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神话对我们思考当今的现代性将有所启迪。现代性就如同人类的俄狄浦斯，它在孕育之初就注定了日后的悲剧和灾祸。从现代性诞生之日起，它便拖着它长长的阴影。知识不再是关于真理的东西，而是成为意识形态的装饰，现代主义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作为宣传手段和胁迫手段，把自己装扮成自我光耀的明星。为了追求新生活，现代世界中的人们如同把灵魂交给恶魔的浮士德，被意识形态以知识的名义指引着奔向新的神话。总之，20 世纪现代性既是流动的又是凝固的，既是同一的又是差异的。它既开启了对在场的批判和新生活的可能性，同时又成为新生活的意识形态而走向它的对立面，现代主义及其后果造成了风格的缺场和一种极其强烈的关于不可能性的幻灭意识和虚无主义。在列斐伏尔看来，“与前一时期相比，现代性带来了极大的幻灭，带来了在过去的自发的或强制的意识形态的陶醉（进步、自由、民主等）之后的可怕的清醒。这些消失了，留下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是自身处在死亡的最终爆发之中的教条主义、信仰行为和制度化的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不能填补的。”^[36]

综上所述，20 世纪现代性并没有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消除一切异化的总体性革命实践，相反，它成为资本积累的进程和经济或技术增长的组成部分。总体性革命实践的缺场致使社会实践的每一个新的行动都将造成风格的新的缺场。风格消失的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复，多种多样的重复正是对风格的模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现代性是对总体性革命实践的拙劣的替代。因此，列斐伏尔认为，只有恢复马克思的总体性革命实践，重建乌托邦主义和对新生活可能性的希望才能重建现代性。

四 空间生产与都市现代性：又一轮“钉在十字架上的太阳”

通过阐释列斐伏尔关于现代性的形式和内涵的理解，我们便不难得出他进行空间分析的理论视域是现代性批判的结论。正像斯塔西斯·库维拉基斯认为的那样，1962年出版的《现代性导论》成了列斐伏尔20世纪60年代之后思想谱系的原点。尤其是“68运动”之后，他更是深入到现实社会历史深处，研究已经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成为社会运行内在机理性的现代性。《城市的权利》（1968年）、《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年）、《从乡村到都市》（1970年）、《城市革命》（1970年）、《差异化宣言》（1971年）、《恩格斯与乌托邦》（1971年）、《马克思的思想与城市》（1972年）、《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力》第二卷）（1972年）、《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年）、《空间的生产》（1974）、《论国家之一：近代的国家》、《论国家之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从黑格尔到毛泽东》（1976年）、《论国家之三：国营生产方式》（1977年）、《论国家之四：现代国家的矛盾——国家的辩证法》（1978年），《日常生活批判Ⅲ：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1981年），以及70年代的一系列围绕都市、空间、国家和日常生活等主题研究的论文都是对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阐述。大概在列斐伏尔所处时期的一个世纪前，马克思面对1848年革命失败而在后续的岁月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采取了更“实证的”姿态。同样的，本书认为，列斐伏尔对空间、国家问题和都市日常生活所作的辩证的考察正是对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在50~70年代得以确立和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也就是说，列斐伏尔要考察的是空间意识的觉醒和关于空间观念的革命怎样开启了现代性的新阶段，新城市建设和现代都市主义意味着什么，是否能赋予新生活以新的意义，国家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在这种现代性实践中通向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是什么等重要的社会问题。

第一，空间意识的觉醒和空间观念的革命开启了20世纪现代性的新阶段。在1920年左右，或者更确切地说，在1920~1930年，在欧洲和美国，关于空间的意识正在觉醒，空间观念革命悄然发生。除了文学艺术领域的空间观念变革之外，建筑领域空间观念和实践的变革尤其引人注目。德国的包豪斯学派首先关注到了空间问题，并强调“每一个‘物品’（建筑的、动产的和不动产的），都应该放入其总体当中，都应该在空间中来理解，在空间中理解其周边的事物，理解其各个方面”。^[37]同一时代的苏联建筑师们也致力于同样的努力，他们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因素投射到区分开来的不同区域，试图通过这种革命方式生产出新的空间和全新的社会关系。尽管他们的努力不同程度地失败了，甚至造成了新的更深刻的矛盾，然而，他们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和实践至少表现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并且，至少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为了改变生活就应该改变对空间的占有及其社会形态。列斐伏尔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变化，他从中嗅出了新的现代性即将到来的气息。之后，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和都市问题的研究正是对空间意识的觉醒和空间观念的革命所引领的都市现代性所作的具体而深入的分析。

第二，空间生产与城市革命是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的编码。构成现代世界自我意识的要素以什么方式嵌入现代社会结构是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论题。列斐伏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致力于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性问题研究的。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伴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极大的提高。空间不再只是物的集合或工作的场所而是成为生产的对象。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空间被规划，分成了不同的“阵营”；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战争来说，主要表现为地上、地下的空间的争夺和竞争，比如领土、资源等。从各国自身内部的社会实践来说，为了满足发展和竞争的需要，必须规划空间、分割空间和生产空间，比如对住宅空间、休闲空间、工作空间的规划、分割和生产。总之，二战后的社会实践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过渡到了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生产和都市规划使资本主义成功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列斐伏尔的家乡纳瓦让克斯（Nanarrenx）旁边的新城穆郎克斯（Mourenx）的建设让他对新资本主义借以生存和发展的都市现代性有了真切的经验。“正是在非人的和机械重复的穆郎克斯所产生出来的史无前例的经验中，在其所制造出来的冲突与期待中，传统存在的有限性才得以消解，而现时代男人和女人真正获得解放的地平线才会被开启。”^[38]都市社会将替代工业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方向，都市现代性是新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对马克思的总体性革命实践的替代，是其借以开启和承诺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尚方宝剑。鉴于都市空间成为现时代社会构成的一个特别的维度，空间生产和都市规划便成为列斐伏尔理解和批判 20 世纪资本主义新发展和现代性问题的中介。

第三，空间生产与都市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国家理性。马克思在 19 世纪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立，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可以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来表征的政治概念。并且，马克思意义上的总体性革命性实践必然要消灭国家权力及其官僚制度。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进入 20 世纪，现代性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动力不再主要依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国家理性规划下以空间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尤其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不再是其最终目标，而是它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有效的工具和结构性要素。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管理和生产空间建立一个总体性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控制体系。比如，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炉的《巴黎区域开发与空间组织总体规划》（P.A.D.O.G.）就是国家官僚主义的具体体现。基于马克思对现代性政治意涵的分析，列斐伏尔对都市现代性的分析必然要考察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因而，1976~1978 年，他通过四卷本的《论国家》详细地阐释了国家问题，并提出了“国家生产方式”概念。他认为，国家在现代性和现代世界中处于核心地位。在 20 世纪，国家及其政治权力并没有消除，反而在替代总体性革命实践的都市现代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国家把科技、知识变成护卫其权力的意识形态，通过“技术专家治国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确保一切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且，国家已经具有世界性，每个国家都经历着类似的发展进程，国家的世界性体系正在建构一个管理地球的一元的世

界国家。黑格尔的绝对国家观念成了现代世界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世界是黑格尔的”。因此，**作为社会产品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是透明的和中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间的生产和重组以及城市规划和都市社会的建立是体现现时代国家机器本质的“技术专家治国制”的具体规划。**

第四，空间生产的矛盾性是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矛盾的本质体现。毫无疑问，空间生产和都市社会的创建为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人类通向自由和解放带来了新的曙光。同样不可置疑，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也从未如此躁动不安，人类也从未如此陷入绝望的囚笼。列斐伏尔曾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太阳”来隐喻现代世界的深刻的异化状态。太阳隐喻着伟大的具有创造力的宇宙循环，生生不息的自然本性本身包含着积极的自我否定。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意味着宇宙循环的终结，失去光辉的钉上十字架的太阳成了分裂、蒙羞、失败和无望的隐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太阳是失去和被毁坏的活力、被自身历史的阴影变得暗淡的革命，一代人、一个时代、被奴隶制度和战争恐吓的国家以及他们自身解放的命运，东方国家、亚洲、非洲的多重象征。”^[39]正因为现代都市世界既呈现无所不能又表现为无能为力的截然相反的双重面孔，所以，可以说，新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与都市现代性是又一轮“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太阳”。早在《现代性导论》收录的于1960年4月写的“关于新城镇的笔记”一章中，列斐伏尔就以辩证的目光审视处于开端的都市现代性的矛盾性。关于新城镇穆郎克斯的建设，与当时人们普遍的乐观心态不同，列斐伏尔对此都市革命忧心忡忡。“在穆郎克斯，我们站在什么的开端处？社会主义还是超级资本主义？我们是正在进入一个欢乐的城市，还是跌入一个不可救赎的无聊世界？”^[40]穆郎克斯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分离和重复让列斐伏尔对都市现代性的矛盾性有所觉察。之后，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中，他对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抽象空间的矛盾性，都市规划背景下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以及现代世界中的最根本的作为整体的空间与空间碎片化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正是基于对现代性的矛盾性的理解，以及对都市现代性的矛盾性的分析，列斐伏尔才强调应辩证地看待这一社会实践并始终对新世界和新生活抱有乌托邦的设想。因为，矛盾性的社会空间和空间的生产在为新世界和新生活开启一系列可能性的同时，也把自身揭示为对可能性的关闭和总体性革命性实践的失败替代。充满矛盾性的空间的生产和都市空间即便是一轮“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太阳”，它也是有意义的。新生活和新生活意识就在于对分离的跨越和对永恒的战胜，空间的生产和都市社会的建立为新的可能性敞开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一直倡导的“都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恢复就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实现都市权利和差异的权利就意味着一种总体性革命性的社会实践，通过颠覆由国家及其政治权力控制和管理的“自上而下”的支配性的社会空间，把世界“翻转”为“取用置于支配之上，需要置于命令之上，使用置于交换之上”的普遍性的自我管理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空间，重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消除异化，重塑日常。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对于20世纪现代性问题的阐释既不是为现代性辩护，也不对

其进行攻击，既不是为现代性将带来历史完美结局的观点提供佐证，也不是要得出现代性会导致资产阶级和西方文明消亡的观点。他试图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分析，在对正在建立的都市社会现象的分析中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空间化逻辑，通过对现代世界日常生活变化的研究厘清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改变现代世界可能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正因为如此，他把结合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空间分析视为一种解码现代性的元哲学。总之，列斐伏尔立足于 20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历史现实，对空间、都市、国家和日常生活这些相互交织、相互回应的主题的研究构成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独特理解和阐释。反过来，列斐伏尔通过空间分析和日常生活批判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运行图式和构成机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展现“改变世界”的可能性的尝试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关于现代性的理论。

第三节 研究范式：三元辩证法

理论关照现实的基础是科学的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辩证法视为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核心和理论内核。为了理解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列斐伏尔同样重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列斐伏尔从写作《被神秘化的意识》开始，一直致力于同各种封闭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经济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及战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居于主流地位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哲学都是他作品中不断批判的对象。在研究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空间生产以及都市问题过程中，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性概念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批判性分析，而且通过重新审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尼采的生命哲学和现代性思想，对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重新阐释和进一步发展。

一 对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再思考

人们对现代世界和现代性的研究总会与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相遇。这三位思想家都深刻地把握住了现代世界的某些特征，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形成于 19 世纪末并因而导致 20 世纪及以后世界的社会发展的矛盾性。对于这三位处于现代性开端的思想家，列斐伏尔更是推崇备至。他断言，现代世界是黑格尔的，同时，现代世界也是马克思和尼采的。他认为，我们不能分别单独研究这三位思想家的思想，对于这三种交相辉映、指引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理论，应该同时对其进行思考、比较、借鉴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超越它们，形成与“真实”、与实践相关联的解码神秘的现代性的伟大思想。

我们知道，黑格尔一生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即青年时代的法国大革命，成年时代的拿破仑的统治和老年时代的普鲁士的解放战争。他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

系的思想也随着这些经历而发生着变化。他认为，法国革命的失败在于尽管它制造了一场变革，摧毁了一个无法代表理性自由的国家，却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共同体。由此，黑格尔察觉到了伴随现代性而出现的利己主义的实存（市民社会）和共同的实存（国家）之间的对立。在经过拿破仑的统治和普鲁士战争之后，他由一个对现存的彻底批判者变成了现存的坚定辩护者，通过把现代国家视为“全体的自由性”和“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来调和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他从精神出发在本体论上把现代国家理解为绝对者。“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41]由此，现代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因为“国家的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着特殊的利益，它是特殊利益的实体”。^[42]这样一来，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成了黑格尔哲学精神的化身，黑格尔也就成了普鲁士官僚国家的代言人。列斐伏尔是通过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解到黑格尔是通过国家来把握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他认为青年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反思和现代性的分析就始于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因此，他认为，如果把黑格尔对现代世界的反思用一个关键词概括的话，就是“国家”。

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上，与黑格尔强调国家不同，马克思更多的是强调“社会”。他认为，黑格尔只是揭示了现代国家的本质，却把现代国家的本质与国家的本质等同起来，把合理的认为是真实的，这与非理性的现实相抵触。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区分社会和国家。他认同黑格尔关于社会是满足单个人物质需要并使之在其中相互发生关系的观点，但他批评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43]。马克思更强调社会和国家二者之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调和自我矛盾的机关，只不过它日益表现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更强调市民社会及其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4]鉴于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人们之间的现实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不是国家巩固市民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因此，政治解放最终只能通过人的解放来完成。马克思试图通过市民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导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并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中真正的自由，从而扬弃掉黑格尔的“国家市民社会”。相比于黑格尔的调和，马克思则选择通过革命破除市民社会 and 国家的抽象对立。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区分、他的社会观，甚至

调节个人的利己生活和类生活的矛盾的方法都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

作为现代世界的批判者，尼采认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可能导致暴政的激进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带来新的文明和社会的真正的变革。与寄希望于国家或市民社会不同，尼采重新反思文明及其价值，并主张通过个人生活和生活经验反对现存世界的政治压迫和“生产主义”。他蔑视资本主义社会里退化成“蠕虫”、失去超越和克服自身能力的“末人”。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他发出诘问，“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以便超越呢？迄今，一切生物都创造了某些超越自身的东西。难道你们愿做这壮潮中的落潮，宁愿退化为动物而不为超人吗？”^[45]他憧憬“超人”，超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形象，而指代一种新文明、新价值和新世界。站在“上帝死了”的深渊之上，人宛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中那个走绳索的演员，在从动物通向超人的道路上，尼采不是求助于客观理性或历史理性，而是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呼唤对身体的恢复。身体应该是“一种伟大的理性”、“具有某种意义的复合体”，它“总是在听、在找，它比较、强逼、征服、破坏，它统治着，但也是‘我’的统治者”。^[46]“我”完全是“身体”，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和权力意志。人和人的世界就是时刻面临危险不断自我毁灭的主动的生命，不断“超越自己而创造”的权力意志。通过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生活经验的恢复，尼采寻求着一条重建文明和世界的道路，并肯定了不断生成和不断创造的价值。相比于精神的自我运动和工业理性推动历史的不断发展，身体的恢复和文明的重建更能从当下改变。正因为如此，列斐伏尔模拟兰波的口气说：“如果有人想彻底改变世界，现在就改变，这个人就是尼采。”^[47]

黑格尔的“国家”、马克思的“社会”和尼采的“文明”都抓住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代性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对于这一点列斐伏尔深信不疑。然而，困扰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号称“自由的卫士”的黑格尔，发展了辩证法三元结构的黑格尔，他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被歪曲成了反映论？黑格尔该为国家的理论化这样的后果负责吗？同样，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被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化，遵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却导致了加强和深化国家的中心化的事实，马克思难道该为这样所谓的也许是一个“历史必然性”或非工业化国家社会不可避免的政治实践负责吗？同样，我们能把尼采的理论视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而草率抛弃吗？如果要发现他们的理论与现代世界的关联，如果要真正超越这三种伟大的思想，我们必须回到他们的文本，研究他们的哲学体系和方法论以及对政治生活的渗透。列斐伏尔正是在回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并吸收尼采的思想基础上来恢复辩证法的革命性和生命力的。

二“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的三元分析

列斐伏尔认为，反思的思想总是强调对立的两个方面，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范式就表现为二元一组的范畴，比如：主体和客体、心灵和身体、连续和不连续，开放和封闭等。近代哲学更是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比如笛卡尔的“我思”和“我

在”，康德、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自我”和“非我”。列斐伏尔批判这种二元论是通过简化还原以“构想的”世界统摄“现实的”世界，“**他们的二元论完全是精神的，并剥去了由生命、思想和社会的生存活动所构成的一切（换言之，剥去了源自于身体、精神和社会，也就是来自于经验的、感知的和概念的生存活动所构成的一切）。**”^[48]列斐伏尔认为黑格尔发展了辩证分析的三元结构，比如：“质、量、度”、“有、无、变”等。这也正是列斐伏尔要从黑格尔的方法论中吸取的要素。他认为，三元分析可以超越二元的对立和对抗，更好地理解 and 展示生成和变化，使辩证分析永远处于开放的态势。然而，列斐伏尔认识到，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式的三元结构只是一种表现变化的表象，因为“合题”既可以是表示超越其他二个矛盾元素的一个外部的“他者”，也可以成为包罗和抑制辩证矛盾，终结可能性的那个“一”。在黑格尔那里，矛盾的辩证运动最终封闭为一个完美的精神体系，理性是自足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具有“吞没”市民社会，控制和界定文明的职能。因为黑格尔把国家视为普遍理性的化身，自身拥有内在的理性生命力，自足地生产和再生产自身。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看到了**停滞的总体性，他曾宣称要把在黑格尔那里“倒立着的”辩证法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运动从思维领域扩展到社会存在领域，通过对劳动的辩证分析理解人类社会异化的历史。尽管马克思把辩证法应用到了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使辩证法从精神世界回归到属人的生活世界，但马克思设定的第三个方面往往是以历史目的的姿态出现，所以这个第三个方面虽然试图阻止辩证运动在黑格尔那里的停滞，但它仍然带有确定性的趋势，并被误认为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三个一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旨在生产变化，但目前为止这一宏伟的抱负并未完成，尤其是国家和共同体（被历史所否定，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被重建）问题。”^[49]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是在历史变化中寻找或辨别出一个方向或一个前景，如果教条地对待他们发展的三元分析，把通向可能性和偶然性的第三方面降低为一个必然性，那么矛盾最终将消失，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泥沼。尼采为了反抗这种精神对实在的统治，曾向世人大声疾呼，“**统一性（一元论）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是力的信号。不要否认世界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测的特性！**”^[50]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的辩证法，用辩证唯物主义关照现时代的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列斐伏尔积极揭示尼采思想所包含的解放潜能，通过吸收尼采对生命经验和身体的恢复以及对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压迫的批判来加强辩证法中的第三个方面，恢复具有开放性的、表现不断生成和偶然性的三元辩证分析。

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世界是国家、社会和身体（空间）的三重决定。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现代性思想相互对立又相互涵盖，如果只注重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或任何一重因素，都无法对现代世界进行成功的理解。并且，在理解生成和历史进程中，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凌驾于其他两个之上。在这个三元结构中，列斐伏尔把尼采的“身体”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那样，将其置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中，“无论如何，我们目前的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

社会实践视为身体的延伸,这种延伸作为在时间中的空间发展的一部分,也因而作为被生产出来的历史性自身的一部分。”^[51]身体和生命经验是尼采理解生成和历史的一个内在视角,相应的,社会空间被列斐伏尔视为社会的有机身体,视为理解社会存在和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本体论要素。“整个(社会)空间始于身体,不管它怎样使身体变形以至于可能彻底遗忘了身体,也不管它如何彻底地与身体决裂来消灭身体。”^[52]列斐伏尔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命的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生产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人类社会实践主要表现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交互作用,“资本主义的到来,尤其是‘现代’新资本主义的到来,使情况变得更复杂。我们必须考虑三重相互影响:(1)生命的再生产(家庭);(2)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阶级);(3)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这三重秩序中,空间的角色需要被详尽地考察。”^[53]为了能够辩证地理解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为了理解空间在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列斐伏尔用具有生产性和历史性的“社会空间”代替了还具有抽象和非社会性意味的“身体”概念,使一直被忽视的身体和社会实践中的空间矛盾在辩证分析中立有一席之地。从而,列斐伏尔完成了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改造,使依附于时间性的辩证法恢复了空间性维度,构造了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三位一体的“时-空辩证法”。对于列斐伏尔把空间本体论化的做法,索亚曾称赞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索亚说:“当存在的三元辩证法化解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关系时,空间性就被边缘化为背景,成为反映、容器、舞台、环境,或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外在约束。在从康德、黑格尔到海德格尔、萨特等许多批判性哲学家的著作中,在批判性社会理论家(随便举几个例子:西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吉登斯、哈维等)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默默地努力恢复空间更为中心化的地位。但是,在顽强并成功地激活空间性、使三元辩证法重新获得平衡方面,谁也不能与列斐伏尔相比。”^[54]

在此,本书要强调,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是一种“时-空辩证法”而不是空间化辩证法。因为他并不是要否定社会现实和人类发展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而只是想强调空间和身体也是理解社会现实必不可少的要素。一切发生在时间里,同时,也发生在空间里。空间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背景、容器,因为人类生产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被印刻在空间中,在这一进程中又生产着空间。”^[55]另外,就列斐伏尔要恢复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三元结构而言,他也不希望自己的辩证法陷入简化还原的非此即彼的元二元论或朝向某种必然性的同一性哲学,他引入空间性作为第三元就是为了打破传统形而上学对主体与客体、身体与世界的区分,重新整合近代哲学精神与空间的分裂。

三 三元辩证法的内涵与旨归

在对社会存在的三元分析中,列斐伏尔恢复了空间性的合法地位。在对社会空间的三元分析中,列斐伏尔试图通过空间这个中介达到对复杂世界的一元的整体性的理

解，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具体来说，三元辩证的空间分析坚持了整体的具体的统一，坚持了前进-回溯的历史性分析，坚持了历史现实矛盾运动的偶然性和永远开放、不断生成的历史真理。

（一）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

列斐伏尔与卢卡奇、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致力于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整体性（总体性）原则。在他看来，整体性地阐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仍有生命力和革命性的关键。**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类似马克思的“劳动”，是作为一个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概念来阐述历史过程的。**他说：“有人选择其他梳理现代复杂世界的方式，比如文学、无意识或语言。**我选择了空间。**我的方法前后一贯，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概念之中，我要努力揭示其全部的内涵。”^[56]空间不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而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与历史性、社会性同等重要的本体论维度。相应的，某一学科单独地对空间进行研究不可能达到对空间的整体性的认识。因此，列斐伏尔强调研究空间问题要把人种学、人种论、人类地理学、人类学、史前史和历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知识重新集合起来。同时，列斐伏尔深谙马克思的整体是具体的整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运用整体性方法对人类历史分析的成功之处在于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思维对具体的再现。为了避免自己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把原本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具体的整体降格为抽象的整体的错误，他用三元分析来阐释作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整体的“社会空间”概念。**他把社会空间理解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的三位一体。也就是说，空间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三位一体，这个一元的整体性的社会空间既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空间和亲身经历包括感觉想象的空间。**通过这个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社会空间概念，列斐伏尔继续着马克思的事业，进行着整体性阐述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努力。

（二）坚持回溯-前进的历史性分析

把社会空间理解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的三位一体实际上就是通过三元的辩证分析实现具体的整体，把时间和空间统一于历史中。社会空间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在人类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社会空间被生产出来并生产着人类生产的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人类形成的关于空间的概念与能够感知和亲身经验的社会空间相互作用，不断生成着社会历史的空间维度。因此，列斐伏尔提出，在这一整合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三元分析中，作为所有人的整体活动及其产物的社会空间必须历史地加以考察，**空间分析应该是回溯-前进（regression-progression）式的。**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视为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应从这种最发达的生产组织形式出发来考察历史。他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

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57]列斐伏尔也从这一最发达的生产组织的当代形态出发，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所生产的空间出发，去追寻其起源，在回溯基础上再阐释现在，并预见未来与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集中阐述空间分析理论的《空间的生产》被誉为“一本真正的关于历史的书”。

（三）坚持再现变化和永远保有开放的态度

发展辩证法的三元结构是列斐伏尔一直致力于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使辩证法呈现开放姿态的努力。列斐伏尔强调，三元分析的三个方面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三重要素中每一个方面都可以也应该在与其他两个方面中的任意一个的相互关系中得到理解。并且任何一个要素对于其他两个都不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辩证分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入都打破静止和封闭，三元分析通过多样性的相互作用来呈现或趋近真实的变化。尽管列斐伏尔试图使辩证分析的三个方面表现得没有序列分别，但我们还是能从他的阐述中看出他对第三方面的偏爱。

列斐伏尔在《在场和缺场》中列举了多个三个一组，以下是其中一部分^[58]：

形式 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 肯定 总体性 旋律

结构 虚无主义 思辨 否定 矛盾 节奏

功能 相对主义 理论 超越 可能性 和弦

物 在场 历史 哲学 同一 主体

产品 缺场 空间 科学主义 矛盾 客体

作品 表象 世界性 元哲学 差异 个体

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总是在给出传统对立的二元范畴之后列出他所偏爱的第三个方面，而且作为第三个方面的要素总是包含着超越其他两个方面的特质。在“肯定-否定-超越”的三个一组中，“超越”没有了黑格尔的“扬弃”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步主义的倾向，反而更接近尼采的“克服”概念，使这一个辩证运动不再闭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具有开放的姿态和永恒轮回的气息。在“总体性-矛盾-可能性”中，前两个方面分别表征同一和分裂，而“可能性”同时包含二者，它既可能朝向“同一”，也可能走向“分裂”。同样，“主体-客体-个体”中的“个体”就是列斐伏尔在二元对立中引入的第三个方面，是他试图恢复的具有创造力和超越能力的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历史性的存在。“哲学-科学主义-元哲学”中的“元哲学”就是对哲学或科学主义的超越。元哲学是对反思的反思，不仅分析在场和缺场，而且把表象也视为世界的内在部分，通过超越纯粹的思辨或纯粹的经验主义成为更接近具体而复杂的现实的理论。

正因为列斐伏尔对三元分析的第三个方面的偏爱，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中的“空间性”要素被寄予厚望。“空间性”是列斐伏尔借以理解资本主义

社会现代性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总体性要素，空间分析“指出通向一个差异的空间，一个不同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的道路。这一计划跨越科学和乌托邦、现实和理想、概念构想的和亲身生活经历的鸿沟。它通过探索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辩证的关系，以克服这些对立”。^[59]总之，三元分析是理解变化和再现变化的辩证法，**在对立的两个概念中引入第三方面，它意味着可能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三元辩证法的理论精神就是持续地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批判，通过不断探求和生产差异，面向新的可能性和新的生成。

通过对列斐伏尔现代性思想和三元分析的方法论的阐释，我们可以对列斐伏尔为什么选择空间作为研究对象，以及其空间分析的方法论特征和理论旨归作出明确回答。第一，空间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位于 20 世纪初的空间观念革命开启了新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进行的空间生产使传统工业社会正在瓦解，都市社会正在形成。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与他对都市现代性的反思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第二，面对都市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在于表征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结构中出现了空间性缺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本体论维度，空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通过空间布展规划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的历史时期。第三，列斐伏尔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在社会存在的二元结构中引入第三元，在历史中重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通过对作为整体性概念的社会空间的三元分析，揭示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辩证地理解运动和生成，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可能性，而不是指出或达到某种确定性。列斐伏尔的三元分析旨在表明人类的生成是一个面向未来开放的、充满矛盾性和偶然性的历史过程。

在本章中，笔者主要阐释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的理论缘起、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笔者的观点是，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是对马克思关于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承和发展，是在都市化的现实历史进程中对 20 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揭示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思考，是对日常生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空间批判的理论视域是现代性批判，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与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空间知识得以形成的思想原点是他关于 20 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式与内涵的批判性分析。具体来说，20 世纪上半叶除了俄国的政治革命之外，在西欧和美国还发生了以空间意识和空间观念变革为特征的文化革命，这是 20 世纪都市现代性的开端，而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和新城市建设是都市现代性的具体社会实践。都市现代性具有双面性：一方面，空间生产和都市社会的创建为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人类通向自由和解放带来了新的曙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也从未如此躁动不安，人类也从未如此陷入绝望。空间的生产和都市现代性成了新一轮“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太阳”。于是，对于人类发展前景和历史将往何处去的诘问成了对都市现代性反思难以逾越的问题。列斐伏尔既不是盲目乐观地无视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是极度悲观地无视空间生产所产生的正能量。问题的答案在问题本身。列斐伏尔试图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分析，在对都市社会现象的分析

中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空间化逻辑，通过对现代世界日常生活变化的研究厘清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改变现代世界可能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因此，列斐伏尔通过把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进行改造来形成可以揭示变化和可能性的三元辩证唯物主义。这种三元分析既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元结构又避免了它的保守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避免了陷入“资本-劳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教条的二元范畴，既引入了尼采的“超越”又避免了相对主义导致的虚无主义。总之，列斐伏尔试图通过三元分析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开辟一条理论与实践相连的道路。

[1] [英]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 34 页。

[2] 本书把以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西欧国家为阵地，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开创的、发端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 60 年代达到顶峰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为代表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赖希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斐伏尔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3] [英]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 13 页。

[4]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 229 页。

[5] [英]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 14 页。

[6] 转引自 [美] 爱德华·索杰《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 59~60 页。

[7]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I,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With a Preface by Michel Trebits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10.

[8] 衣俊卿编《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 517 页。

[9]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I,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With a Preface by Michel Trebits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17.

[10] [英] 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周宪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90页。

[11] E.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p.34.

[12]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

[13]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Edited by Jacques Bidet and Stathis Kouvelakis, Leiden·Boston: Brill, 2008, p.711.

[14] 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292页。

[15] 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533页。

[16]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三种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关于现代性的虚假争论》,载《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05页。

[17] 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27页。

[18] 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19页。

[19] 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8~11页。

[20]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69.

[21]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70.

[22]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65.

[23]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73.

[24]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70.

[25]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p.173-174.

[26]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

[27]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91.

[28]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3.

[29]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228.

[30]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78.

[31]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90.

[32]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232.

[33]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90.

[34]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p.189-190.

[35]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230.

[36]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228.

[37]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20页。

[38]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Edited by Jacques Bidet and Stathis Kouvelakis, Leiden·Boston: Brill, 2008, p.713.

[39]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96.

[40]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p.119.

[4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60页。

[42]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69页。

[4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19页。

[4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45]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2000，第6页。

[46]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2000，第28页。

[47]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03, p.43.

[4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9.

[49]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03, p.66.

[50] 〔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202页。

[5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49.

[5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405.

[5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2.

[54] 〔美〕爱德华·索杰：《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91

页。

[5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29.

[56] 转引自〔美〕爱德华·索杰《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60页。

[5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页。

[58]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03, pp.50-51.

[5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60.

第二章 列斐伏尔对空间概念的考察

人类历史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同样，时间和空间以及二者的关系总是必须历史地加以考察。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通过对现代性的生成机制，即**脱域理论（disembedding）**的阐述对此作了精彩的分析。他强调，在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时间是与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人“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同时，“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经验式的和自然的生存方式。而随着标准化时间或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出现，时间与地点相分离，同时，也出现了虚化的空间，空间也与地点相分离。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社会行动开始从经验化的地域情境中脱离出来，人们开始脱离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从“在场”走向“不在场”。时-空分离为理性化组织运行提供了动力机制，为社会脱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提供了多种变迁的可能性。吉登斯指出：“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从前现代社会的统一到现代社会的分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确切地说，时空分离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

列斐伏尔也是基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展开对空间概念的考察。在他看来，空间的现实表现形态以及观念表现样态从根本上源于人类的历史性实践形态。与前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的依赖”这种实践形态相对应的空间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的自发统一。但是，现代社会打破了这种统一，将时空分离开来。由此，人类的实践也处于深刻的分裂之中。由时空分离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经验逐渐内化并确立为人们的生活经验。近代思想家往往在无批判地肯定时空分离的基础上把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并强调时间。因此，在理性的简化原则和知识的过度分化的条件下，原本时空相统一的空间概念表现为时空分离以及时间对空间的压制，更进一步表现为空间概念在物质、精神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分裂和对抗状况。与其说传统形成了特殊的空间知识，不如说它们形成的是一系列没有空间或者说只有抽象空间的空间学说。空间知识的缺失妨碍着人类的自我理解和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把握。于是，他试图通过把时间和历史重新统一到空间中而建立一种关于物质、精神和社会的一元的社会空间概念，进而揭示空间概念的深刻的生命内涵和历史内涵。列斐伏尔所理解的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实践的“场所”，而且是社会实践的表征、展开及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概念与生产概念紧密相连。作为一个被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必定存在相应的生产过程，于是，社会空间是历史地“在场”，社会

空间的历史是作为“现实”的空间的生产的**历史**。列斐伏尔认为，要建立关于空间的批判性的知识必须了解空间的历史，要理解社会和历史的变迁离不开对社会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的分析。可以说，现代性经验是列斐伏尔重新考察空间概念的现实动因，空间知识的危机是他重新考察空间概念的理论动因，人类实践是他考察空间概念的立足点。

第一节 历史中的空间：空间概念历史变迁的批判性分析

毫无疑问，人类从不缺乏关于空间的经验。同样，显而易见，人类尚未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空间经验之外形成统一的空间概念。然而，列斐伏尔发现，在现代世界人们的普遍观念中，空间只是一个数学概念，具有严格的几何意义，代表没有内容的“空”。空间概念长期发展的历史被遗忘了。于是，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讨论首先不得不面对历史上关于空间概念的争论。他对以往的空间概念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为之后社会空间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地埤。

一 传统形而上学的空间概念

哲学的开端是紧紧地与希腊城邦的“真实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但随着哲学的发展，这种联系被割断了。后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把知识视为社会实践，通过沉思达到对事物的认识从而获得知识。这一时期理论实践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把空间作为事物分类的一个范畴。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既不是质料，也不是形式，而是事物的“直接包围者”。空间是有限的、静止的、包围着能运动的事物而又可以与其相分离的“限面”。也就是说，一方面，能运动的事物与空间不可分，因为空间不是一个有形的独立的体积，只有能运动的事物才在空间里，并且，每一能运动的事物都有一个不大于也不小于它的自己特有的空间；另一方面，空间并不必须和事物同时增长，不动的空间与空间中能运动的事物是可以分离的。在这里，我们可以隐约窥探到空间脱离事物走向绝对化的倾向。

到了近代，哲学范式从“思想思想”转变为“反思思想”，也就是从思想思想中的事物转变为思想认识活动本身。笛卡尔对空间的理解奠定了近代认识论空间概念的基础。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把空间作为提供命名和分类的种属，而又使这种种属的地位及其与事物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的话，笛卡尔则毫不犹豫地把空间推向了一个绝对的领域，作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空间成了一个给定的容器，通过容纳主体，也就是容纳所有的感觉和所有的生命有机体而支配它们。空间成了所有存在的内在秩序。因而，他的追随者斯宾诺莎把这个绝对空间赋予了神的属性——空间是绝对存在的属性或方式，也就是，上帝的存在属性或方式。至此，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影响下的近代哲学的空间概念精神化了。牛顿力学的绝对空间完成了空间概念从哲学到科学的转换。虽然康德又回到并修订了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概念，但康德主义的空间已经从经验观察领域

分离出来，成了意识领域的先验结构。空间成了“精神处所”，从而精神空间概念得到接受、继承和普遍化。

总之，列斐伏尔认为，古典哲学或形而上学设定了一个本质的空间，一个“自在”的空间，因而，空间被简化为“精神空间”。这种对空间的理解造成了“自然空间”（physical space）、“精神空间”（mental space）和“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之间的巨大鸿沟。事实上，空间内部的自我分裂是现代性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种抽象的、统一的、消灭了时间的空间，以便为其自由流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组织提供基础。近代哲学诞生之时恰是资本主义兴起之日，相应的，近代哲学的抽象空间概念只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在观念上的反映。

二 19 世纪：时间的凸显与空间的退隐

就根本而言，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彼此分裂是时间和空间、理论和实践分裂的结果和表现。正因为排除了时间和经验，空间才不受制约地成为抽象的绝对。问题是，当我们提到空间时，首先要追问“什么在占有空间”，而对“什么”的追问会把我们引到时间轴线上。离开时间的空间是难以理解的，尽管传统形而上学的空间观被理解着，但只是被抽象地理解。针对空间的分裂这一认识论和社会学事实，19 世纪的思想家一直致力于弥补这种分裂，并努力形成关于自然、精神和社会的统一的空間理论。

在列斐伏尔看来，要想了解现代哲学关于空间的理论探求，有必要回到黑格尔。黑格尔虽然不是第一个把时间，特别是历史时间引入哲学理论的人，但他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宏大的历史感却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在这种优良的历史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抽象空间却消灭了它。依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时间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是绝对精神的内部之事。虽然历史时间生产空间，但这种时间只是由国家占有并控制的空间。反过来，空间虽在历史时间中生成和表现，但它始终是不断实现自身的理性的场所或环境。最后，时间被理性的社会空间征服，从而时间消失了，历史终结了。基于此，列斐伏尔评价道，“黑格尔把空间作为产品和历史时间的剩余物”^[2]。也就是说，黑格尔试图整合时间和空间、使之统一的努力失败了。

因此，之后的哲学必然要寻求时间的重建，弥合时间和空间的分裂。于是有了马克思把历史时间作为革命性时间而恢复了它的权利，有了柏格森恢复精神时间和唤醒意识直觉的努力，有了胡塞尔的自我主体性的现象学，有了以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现代的“反俄狄浦斯”情结等。但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些努力或多或少是失败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地将时间向度引入历史，但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认为历史有意义、有方向的理性主义历史观，而且由于马克思更感兴趣的是历史，因此空间在他那里隐而不显。列斐伏尔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时间概念是历史性被生产力驱使，并被工业、无产阶级和革命理性引领着方向。”^[3]柏格森、胡塞尔、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德勒兹的

欲望哲学等等重新把空间和时间解释为早已被宣告“死亡”的抽象主体的活动结果，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只不过是抽象主体的自为状态而已。

在列斐伏尔看来，尼采是自黑格尔以来唯一保持空间原初性并关注空间与时间关系的哲学家。一方面，尼采打破了理性主义时间观的魔咒，提出历史永恒轮回说。轮回并非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无限次地重复和循环，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指出的，不是动物和“侏儒”心中的轮回，而是“超人”对自身的否定和超越式的回归。因此，轮回之中包含着排斥同一性、体现生命力的差异。时间因而不是抽象的，而是能与有某物存在的空间相容的。另一方面，尼采提出了辩证的空间观。在生成的范围内，每一个事物，无论是社会的、精神的还是身体的，都力求建立并保持自身，反抗流变的时间。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绝对空间。但同时尼采认为绝对空间并非是抽象无物的。在空间原初的意义上，尘世空间和社会空间像宇宙空间一样，包含着“能量”（energy）和“力”（forces），并通过它们维持、否定和继续自身“有空间的地方就有生成”，而且能量和力只有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作用才能被识别。如此，时间表现为在一定空间中的能量和力的轮回，反过来，空间表现为能量和力永恒轮回、实现自身的场所。时间和空间通过能量和力这样的中介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此，列斐伏尔在谈到尼采的时间概念时指出：“尼采的时间是普遍悲剧上演的剧场，死亡和生活的循环、重复的空间-时间。”^[4]列斐伏尔之所以推崇尼采，不仅是因为他恢复了空间的本真之义，而且因为他敏感地触及了现代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

尽管列斐伏尔没有解释为什么 19 世纪重构时间的努力多数归于失败，但大概可以想到的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在资产阶级有谋划地实现时间和空间相分离的社会环境里，在由时间和空间相分离而构建起来的制度中，那些思想家似乎很难逃离这种社会结构的禁锢来客观地考察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除非像尼采这样的天才。即使在 20 世纪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那里，时间和空间的统一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被解决。卢卡奇就是一个代表。他反黑格尔，却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强调具体的总体性，但他似乎更对总体性着迷。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更注重阶级意识或意志。空间与具体相关，因而成为虚假意识。重新被发现的时间在总体性阶级意识的指引下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纵览历史的扭曲并转眼就改变，打破空间的主导性地位。与其说卢卡奇重建了历史时间，不如说他更加强调阶级意识（早期）或人的“自为性”（后期）在时间进程中的展开。

三 20 世纪：空间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遵循着“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一原则，那么在 20 世纪，空间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早在 1967 年，福柯便从时空角度精辟地阐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颠倒性差别。他说：“我们知道，19 世纪迷恋的是历史，迷恋的是诸如发展与停滞、危机与周期的主题，不断增长之过去的主题等，迷恋的是压

倒性多数的死者和气势汹汹的冰川世界。19 世纪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发现了它基本的神话根源。但是当今这个纪元也许将首先是空间的纪元。我们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与近的时代，一个比肩的时代和弥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与其说是在时间之中发展的漫长生活，不如说是一个用自身的经纬联结诸点和交叉点的网络。”^[5]而随着空间地位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的日益突出，后现代主义更是夸张地将后现代主义和空间性等同起来。

人类的空间意识之所以在 20 世纪初开始觉醒，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实践结构的深层转变。众所周知，19 世纪是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形成并加以确立的阶段。在此阶段，资本主义的主要任务表现为两个，一是打破并消灭旧社会的一切障碍和束缚，二是发展经济以巩固自身。旧的消失，新的出现，这是一个时间性主题。发展经济，积累资本，同样是一个时间性话题。可以说，早期资本主义更多的是用时间在表达着自己的节奏。当充分激活时间的作用时，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切似乎都具有时间向度。人通过时间来积累物质财富，资本、商品、货币在时间的延伸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剩余价值在工作时间的压缩和延长中被生产。资本主义经由时间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资本主义更多地表现出时间向度时，人们不约而同地重视时间或历史便是可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用时间“消灭”了空间，而且它也不可能消灭。合理而又恰当的说法是，空间隐而不显。事实上，空间一直隐蔽在社会结构的深处与时间共同发挥着效用。马克思曾详细地分析过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工厂的分工，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通过空间对工人进行隔离，既能有效地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也能有效地控制工人。进入 20 世纪，通过量的积累来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开启、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危机的反复、工人运动的爆发等等促使资本主义重新思考自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资本贪婪的本性，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转和牢固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将狡黠而恳切的目光投向了空间。延展空间有助于开辟更多的世界市场，获取原材料，输出商品和资本；分割空间，将日常碾成碎片，有助于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同质化空间，将社会整体同一化，有助于从总体上强化国家的权力；用空间来消灭时间，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是永恒秩序这一信念；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空间已然成为资本主义实践方式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空间的生产来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关系以维持自身。对于 20 世纪资本主义空间维度的日益明显这一事实，列斐伏尔说：“空间在现代社会具有日益重要的角色。”“空间的霸权不只是在‘微观’层面发生作用，也不只在宏观层面发生作用，为流通秩序负责。相反，它的影响在所有方面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中。”^[6]在这种情况下，空间意识的觉醒便在情理之中。

早在 1910 年左右，先锋派画家们便在他们的实验性活动中着手将意义和表现分离，重新恢复人的主体性。在他们看来，画的无意义恰恰就是意义所在。实际上，这种对画面空间的暴力重组是他们在面对这个碎片化世界威胁时的艺术本能反应。而同时代的毕加索也发现了一种新的绘画方式，没有地平线，没有背景，画布被整个占用，

画布表面被分成了画与画的空间以及围绕它们的空间。他用“立体主义”对抗“平面主义”，用差异空间来对抗同质空间，用“暴力”来反抗碎片化的世界。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在艺术实践中形成的空间意识已经预见到了 20 世纪现代性的空间，指向了抽象空间。但是，艺术领域的空间变革还仅仅“是艺术史学家的天真的产品，他们把社会领域和社会实践放在括号里，把作品作为孤立的实体”。^[7]当一种自觉的空间概念尚未形成，并与社会实践没有关联时，很难说这是一种“觉醒”。

列斐伏尔明确指出，20 世纪 20 年代包豪斯建筑学派^[8]提出的空间概念标志着 20 世纪空间意识的觉醒。“因为包豪斯建筑学派不仅仅在真实的情境中定位空间，或者提供一种关于空间的新看法，它发展了一个新的空间概念，一个整体性的空间概念。”^[9]以往，艺术品主要是由不同艺术家按照自己的主观标准——比如，个人的喜好、品味、生活方式等——来进行创造的。尽管这些艺术品中掺杂有理性的成分，但这仍是一个未被理性规划的空间。包豪斯学派的创始人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实践的理性化趋势。他们知道艺术创作注定要有所改变。他们也知道物不可能在空间中被孤立地创造出来，而必须考虑物与物的相互关系以及物与整体的关系。很自然，他们也就不会孤立地考虑艺术的形式、功能和结构的问题，而是要考虑一个空间的整体概念以便将形式、功能和结构统一在一起。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人们从关注空间中的物转到关注空间概念本身。而同一时期的先锋派艺术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物的所有方面都能被同时思考。对于包豪斯学派的“历史性”作用，列斐伏尔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一种新的空间意识出现”。空间被探究和利用，有时被平面化，有时被深度化。第二，传统艺术所依赖的主观标准消失了，代之以合理化标准。第三，“作为一个等待被填满的虚空，作为一个等待被殖民的中介，整体性的空间在抽象中建立自身。”^[10]自此以后，空间概念便被自觉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从而成为一种空间实践。正是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称包豪斯学派为“革命者”而非“革新者”。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空间概念已在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的社会实践中有所表达，比如，同质化建筑的崛起，只不过尚未获得理性表达。包豪斯建筑学派提出的空间概念或许仅仅是当时社会实践变化的征兆。

就本质而言，包豪斯学派提出的空间概念与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是一致的。按照列斐伏尔的看法，资本主义空间既是同质的，也是片段的，与之相应，空间意识的发展也将朝向同质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发展。一方面是一种抽象空间意识的确立，或者说抽象空间概念的普及，并由此产生一种“抽象空间拜物教”。当社会空间超出人们的视觉范围时，空间的社会实践特征消失并被哲学地改造成一种绝对。进而，人们使自己的存在、生活经验和身体变成了抽象。由此“产生两种实践的抽象：‘使用者’在其中不能识别自身，思想不能采取批判的立场”。^[11]另一方面是关于空间知识的碎片化。在 20 世纪，与社会分工的日益精密化一致，知识领域的分工被大大推进了。各种专门化的学科领域对空间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分割了空间，造成了空间知识的碎片化。关于这一点，列斐伏尔详述道：“抛开数学的拓扑学在其他领域的运用不提，单说绘画空间的认知学

就够有意思了，比如毕加索的阿维依少女的空间和格尔尼卡的空间。在其他地方，我们总是听说建筑的、造型的或文学的空间；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更多地像是在谈论某一作家或艺术家的‘世界’。专门化的领域与同样专门化的空间相连：休闲、工作、娱乐、交通、公共设施——所有领域都以空间术语的方式被谈论，甚至有些专家认为疾病和癫狂具有它们自己独特的空间。于是，我们面对无限众多的空间，层层叠叠或彼此包容：地理学的空间、经济学的空间、人口统计学的空间、社会学的空间、生态学的空间、政治学的空间、商业空间、国家空间、洲际空间、全球空间。还有自然（物质）空间、（能量）流动的空间，等等。”^[12]结果便是，看似各学科提供了一种关于空间的“科学”知识，而事实上恰恰是一种关于空间表象的“虚假”知识。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两种趋势都意味着关于社会空间的真正的知识，也就是关于空间的生产或整体性的空间概念的失落。

总之，对空间知识的理论探求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列斐伏尔认为这种理论实践的后果是，一方面，我们有关于时间的哲学，而且按照不同的思想和关注重点又分为历史时间、社会时间和精神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认识论构建的抽象空间至今仍是流行的关于空间的观念。通过对以往空间概念的考察，列斐伏尔引爆了由于理性的简化原则和知识的过度分化而造成的“自然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分裂和对抗状况。而他想做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消除学科界限，探求自然、精神与社会相统一的关于空间的“一元理论”（a unitary theory）。

第二节 社会空间：一个生产性的总体性概念

实际上，列斐伏尔批判被简化还原的空间概念归根结底是在批判时间与空间的分裂和分离。因此，消弭物质、精神、社会之间分裂的一元的空间概念一定是不可简化还原的，必然包含时间和历史的维度。而且，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理解历史的钥匙，因此，空间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一个属于意识领域的先验结构，空间是社会存在，是被生产出来的。列斐伏尔正是通过“生产”概念把历史的和时间的维度重新统一到空间之中的。尽管生产空间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列斐伏尔坚信，只有理解空间的生产才能真正理解空间、理解社会。因此，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并能顺利进入他对空间的生产的批判性分析语境之前，我们需要弄清他的生产概念。

一 对生产概念的重新反思

生产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尤其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开篇讲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3]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的。由此，人们往往仅从经济学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而忽略了在马克思的哲学思

考中生产曾是一个哲学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生产理解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他强调，人的劳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生产生活”，“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4]列斐伏尔并不否认马克思曾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概念。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作为社会存在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意识、他们自己的世界。”^[15]但是，在他看来，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生产变成了一个狭义的精确的物质生产概念，甚至被降低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因而仍然是完全抽象的。在同一时期，海德格尔也曾对这种抽象的生产概念进行了批评：“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16]

姑且不论列斐伏尔是否曲解了马克思早期的生产概念，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列斐伏尔批判生产概念的实证化倾向旨在恢复生产概念的辩证性即可。在他看来，生产概念在黑格尔主义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是绝对优先的，具有本体地位。它生产世界，自然、社会、精神都是绝对理念自身发展的产物。生产表现为绝对理念的辩证式的“否定之否定”。在这里，生产虽是精神的行为，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意蕴和存在论意蕴，即把人理解为人的对象化活动。正因为如此，列斐伏尔怀念马克思早期的生产概念甚至想回到黑格尔。他一再强调，生产不能被简化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它对人类的生活来讲是一个辩证的、至关重要的活动。生产意味着全部的人类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其他活动并说明其他活动，因为它包含着并意味着人的本质、行动、知识。”^[17]

为了恢复生产概念的辩证特征，列斐伏尔区分了“自然”和“生产”、“生产”和“劳动”、“作品”和“产品”。首先，他界定了“作品”和“产品”之间的区别：作品只具有使用价值，不可替代，具有独特性，而产品是能被精确地复制和批量生产，并用于交换的重复活动和行为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自然不生产，它创造。自然是广阔的出生领域，它创造个体“存在”，包含着生命的历程。事物自然而然地出生、成长、成熟，然后枯萎、消亡，自然对自己的这种创造一无所知，它是“无动于衷”的。每一树花开、每一颗果实都没有目的，它并不是按照人类的目的运转。然而，“这并不是说它是与我们对立的，或根本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而是说同我们理解的客体或主体相比而言，它是不分什么主客体的。”^[18]因而，自然创造的“存在”是作品，它的每一个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

产生于自然界的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创造不同。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的生产不仅创造作品同时也制造产品。更确切地说，人类的生产“一方面指‘精神的’生产，也就是说创造（包括社会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指物质生产或物的制造；它也指在历史的自我发展过程中‘人类’的自我生产，历史的自我发展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最后，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这个词包含再生产，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领域），同时

也是交易过程中生产工具、技术手段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再生产”^[19]。而且，就同样都是创造作品而言，人类所进行的创造作品的活动与自然的也不尽相同。自然是无意识地创造，而人类的生产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一方面，人类生产以特定的目的或“客体”来组织行为和活动。行为和活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开始时就表象地或者说观念地存在着。诚如马克思所言：“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0]另一方面，与朝向特定的目标和结果密不可分，人类的生产把时间和空间秩序强加在这一进程中。“从朝向目标的活动的一开始，空间性的元素——身体、四肢、眼睛——被动员起来……所有生产性活动被界定为时间性和空间性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来来回回。”^[21]因此，与自然的“无意识”地创造不同，人类的生产内在地具有理性。并且，按照这一分析，空间的理性也不是人类行为和活动，或者社会劳动的结果，而是在于人类行为和活动本身固有的理性中，自身是直接的来源和原因。

因为生产不仅创造，还进行重复性的制造，所以才有了生产和劳动的区分。创造作品和制造产品都需要劳动，但劳动在创造作品中发挥的作用是次要的，而在产品的制造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可见，列斐伏尔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来使用劳动概念的，他认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现象所作的分析。列斐伏尔认为，尽管生产体现人的全部价值，是人的活动的“高级的统一体”，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作为主体确立自己的生存。“但是，当这种活动转而反对人的自身时，就有了外部的性质，并把人类引入社会决定论之中，使人类蒙受了极大的不幸。”^[22]正是劳动的异化使人类的生产丧失了总体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指出，生产所包含的真理至今还没有被全部揭示出来，“因为直至今天，人类的生活还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的，还没有包括它的产生过程。”^[23]

同时，列斐伏尔强调，自然和生产、生产和劳动、作品和产品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的。如果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空间出发，我们将发现作品和产品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的。比如，威尼斯一开始不是人类事先规划好的，它是自然的作品。但是逐渐地，人类的社会实践把这个空间吸纳进了地中海和东方的贸易体系当中，直至目前，威尼斯的所有辉煌都是实现着人类目的的作品和产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产品和作品是相互包含的，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类生产成果同时作为产品和作品出现。同样，生产和劳动也紧密相连，劳动从属于生产，是生产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特殊生产形式，反过来，生产为劳动提供重复性制造所需要的作品。于是，自然界和人类也不是对立的，人类生产出的空间是以自然为地平线的，但又不能仅通过自然得到澄明；自然虽然被人类的活动改变了面貌，甚至遭遇毁灭的威胁，但自然仍然存在着，变化着，并还将不断地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内容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对自然和生产的理解，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

体论追问，不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从生存论意义上，从历史的和实践的方面去理解。因而，生产是一个克服“主体”和“客体”对立的具体的总体性概念。

二 “（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24]

空间与人类生产密不可分，是这一历史进程及其结果。一旦空间概念与这种总体性的生产概念相连，并成为它的内容的一部分，空间就不再是纯粹静止的、客观的、被动的容器，而是社会的产物。人类生产既是“客体的”也是“主体的”，同样，空间既是以往历史和自然的产品和作品，也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知识、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果。因此，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

首先，它意味着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25]如前所述，列斐伏尔界定了“自然”和“生产”以及“作品”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自然”的特点是创造，自然的空间只具有使用价值，并且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的“作品”。然而，这种作为人类社会进程的起点和基础的自然却总是被破坏。在人类的生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实践中，重复性的劳动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的结果是自然的空间正在变为可以被精确复制和批量生产并可以交换的“产品”，自然的空间正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同时，同样触目惊心的是，自然的空间也正消失在人类的思想中。人类对什么是自然，自然的原初状态等问题已不再关心，自然只是各种社会系统生产其特殊空间的原材料。但是，列斐伏尔并不认为自然的空间会完全消失，尽管空间的社会的特征日益占主导而其自然的特征日益衰落，空间也将始终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任何具体的空间都既体现特定的生产关系也同时是自然的一部分。

其次，它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或者确切地说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生产它自己的空间。^[26]空间渗透进生产概念，它就不再是思想的先验性范畴，或实践的先验性材料。特定的社会空间包含着相应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它是社会活动的展开，是物化的场所。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区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他认为，前者主要包括生命生产和社会的物质生产，后者，尤其是“新”资本主义，除此之外还包括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并且这种再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空间变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

再次，如果空间是一种产品，空间的知识就是对空间的生产过程的再现和阐释。也就是说，空间的知识就是对空间的生产这一过程的“解码”。^[27]作为产品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是两个不可分的概念。空间是产品，意味着空间是一个即刻的整体性的社会现实。虽然空间有时间性内涵，因为过去在其中留下痕迹，时间印刻在空间中，但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空间总是“当前的空间”（a present space）。同时，空间又不是一个像其他社会产品一样的产品，它不仅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用于消费的产品，也是生产工具。空间既包括生产的结果，也包括这些结果在时空共存中的相互作用，即物与物之间的一系列关系。正因为如此，空间知识的探索才是可能的。

最后，如果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与生产相关，那么空间具有历史性。^[28]空间是伴随着多个方面和多个趋向的历史进程的结果，每一个社会空间都有自己的历史。并且，按照前一个假设，每一种生产方式生产自己独特的空间，则社会的更替，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需要生产出一个新的空间。那么，社会空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也就是说空间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如前所述，空间是产品意味着它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和这一活动的过程。伴随着自然的创造，人类的生产活动印刻于自然中并逐渐占主导地位，相应的，社会节奏打破自然节奏，空间的社会特征日益占主导地位。于是，从节奏分析的观点来看，列斐伏尔把空间的历史界定为开始于“自然的空间-时间的节奏被社会实践改变之时”^[29]。由此，空间的历史也就是空间的生产的历史，他指出，虽然不能在编年史的意义上给出具体的日期，但空间生产的历史“与资本的积累一致，开始于它的初级阶段，终止于抽象统治下的世界市场”^[30]。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生产的历史是有始有终的，因为，他深信人类历史既不是从社会线性节奏占主导的生产开始，也不会以它结束。

三 社会空间的身体化隐喻

其实，我们对人类生产空间或空间的生产的理解还可以诉诸生命经验。列斐伏尔一直倡导恢复生命经验在哲学思考中的地位。他从身体出发来理解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受莱布尼兹的启发。与笛卡尔科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相比，莱布尼兹对空间的理解更能引起列斐伏尔的兴趣。他认为，抽象的空间对笛卡尔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对莱布尼兹来说，空间不是不可知的而是“难以辨认的”，要想辨别空间需要引入轴、起点、左和右这些元素。列斐伏尔认为，莱布尼兹的本意是“空间必需被占有”。那么列斐伏尔就进一步提问，什么占有空间呢？“身体”（body）占有空间。因此，在这里，关键之点就在于如何理解列斐伏尔的“身体”和“占有”。

列斐伏尔所谓的身体不是肉体，无论是有机体还是无机物，只要拥有行动的能力和多样化的能量，就可以被称为“身体”。可见，身体代表着生命能量和活力。“占有”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占有不等于“填满”，因为填满会导致分离的逻辑。列斐伏尔理解的占有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体在空间中并可与空间相分离，相反，身体和空间是不可分的。在这个意义上，占有可以被理解为“生产”、“创造”、“能量的展开”（deployments of energy），身体“是空间并有它的空间”。因此，身体也不是普遍的身体，而是能够界定空间的具体的身体。也就是说，身体在空间中的展开和它占有空间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身体生产自身并生产它自己的空间，空间是空间化的身体。我们如何理解身体我们就如何理解空间。因此，身体是他理解社会空间的一种隐喻化表达。

列斐伏尔认为：“对于任何有生命力的身体（living body），就像蜘蛛、贝壳类动物等来说，最基本的场所和空间的指示物首先是它的身体。……只是后来，在人类物种的发展中，空间指示物才被量化了。”^[31]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命经验，列斐伏尔强调空间

与时间有区别但二者不可分。比如，树干的年轮是一种空间化实体，它揭示树的年龄。因而，从生命经验出发，当然也是从尼采哲学中获得的灵感，列斐伏尔认为，对世界的理解可以诉诸一个“时间-空间-能量”的三重辩证图式。能量是有生命力的身体的特征，身体的生产就是能量的展开。存在着的能量就必然要展开并且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或者说，有能量的展开就存在时间和空间；谈到空间，就必须立刻指出什么占有和怎样占有空间；时间也是一样。时间和空间没有能量仍然是惰性的和无意义的抽象，能量使时间和空间富有生气、重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时间-空间-能量”的三重辩证图式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它们是彼此分离却又相互联系，并且任何一方也不相对于另外两方具有优先性的三个方面。

四 社会空间的三重辩证图式

空间的生产与生命进程、能量展开密不可分，在生命和能量的存在和创造中，空间得以显现并蕴含其中。列斐伏尔认为完全可以把身体化的隐喻应用于对社会空间概念的界定。在他看来，社会空间是社会身体，是“被一个在（社会的和被决定的/决定的）空间实践中展开的力（forces）（也就是生产力）生产”^[32]的空间。社会空间是“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具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的三位一体。社会空间的生产可以从这三重概念的辩证运动中得到理解。相应的，如果我们从身体出发理解社会空间，这三重图式又可以表达为“感知的”（the perceived）、“概念的”（the conceived）和“经验的”（the lived）。

“空间的实践”包括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构成每一社会的典型的具体场所和空间化的位置。一个社会的空间的实践通过保证连续性和凝聚力，生产并隐藏这一社会的空间。比如，在20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在政府补贴的新兴住宅计划中，作为承租人、房屋的占用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现代”空间的实践的一个极端但重要的体现。

“空间的表象”是概念化的空间。科学家、规划者、都市主义者、社会工程师等通过理论抽象来构想感知的和亲身经验的空间。空间的表象是在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中占主导的空间。它是生产关系及其秩序的表现物，作为一种知识权力，在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中起作用，但它同时是相对的，经常会遭到修订。

“具象的空间”既是作为“居住者”、“使用者”或“占用者”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包括房屋、教堂、广场等；也是一些艺术家、哲学家、作家们所描述但又渴望不仅仅是描述的空间。因此，一方面，具象的空间与人的真实的生活经验相连，与空间的表象作为统治工具生产重复可替代的产品相比较而言，它为空间的实践提供唯一的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具象的空间从根本上来讲是定性的和历史性的。另一方面，它是被统治和被动经历的空间，因为空间的表象总试图改变和占用具象的空间。

如果从身体出发来思考，空间的实践可以理解为“感知的”活动，比如手、感觉器官的使用，与工作有关或无关的活动。因为社会实践以身体的使用为前提；与空间的表象，也就是概念化的空间相对应的是“概念的”身体，它可以被理解为来源于解剖学、生理学等关于身体及其周围环境的知识；与具象的空间相对应的是“经验的”。就像每座教堂有它的历史和独特性一样，每个人的亲身生活经历因“文化”的影响而不同，甚至相当独特。

当然，列斐伏尔把原本统一的社会空间作这样的分割只是为了分析它们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空间的生产中的作用。“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而是彼此分离又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

五 社会空间的二元性

尽管社会空间可以从上述的三重性决定因素中得到理解，但它无法避免它根本性的二元性特征。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生命有机体自产生开始就把自己构造为一个内部空间——一个凹洞或胚胎学家所谓的“胚囊”，与洞相连的壳或膜建立起它的边界，因而分成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一个与外部的空间分隔开的有机体。但内部和外部的分离总是相对的，并是可渗透的，就像有机体总是通过毛孔进行能量交换。在能量交换过程中会产生过剩的能量，列斐伏尔认为，恰恰是过剩的能量使生活和满足最基本需要的生存之间区别开来。过剩能量的消耗，也就是它的生产性使用，产生并决定有机体与它的空间（它自身、它周围的环境，甚至是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空间从来源和分离方面来看是虚构的和想象的，从在时间和空间中共存和区别方面来看是具体的和实践的。空间既是生产性的又是被生产的；空间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中介性的），空间既是连接的又是分离的。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对于空间，我们首先经验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是身体的对立面或“他者”。一方面，每个社会成员使自身与空间相关，在空间中定位自身。在空间中他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直接性和客观性。他把自己作为主体，放在中心位置，衡量自身又把自身作为衡量手段。另一方面，空间是中介。主体通过空间理解其他事物。在这里，社会空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它的双重“本性”。社会空间既是活动的场所，提供规划和实践目的的实施，同时又是获得能量和指引能量展开的基础；社会空间既是实际存在的（给定的），同时又是潜在的（可能性的场所）；社会空间既是定量的，同时又是定性的；社会空间既是物质的集合，同时又是材料的集合。^[33]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了解了作为社会存在的空间的一般性内涵和特征。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及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空间最初是空的，以自然作为社会现实或者生产空间的原点，然后被社会生活填满并被其改变。因为，在精神的和社会的意义上的“空”的空间仅仅是“空间的表象”，而被社会“主体”转变为与

生活经验相连的空间仅仅是“具象的空间”。这样就割裂了社会空间辩证统一的三个方面。列斐伏尔强调：“任何实际的历史地生成的空间与其说它自身被社会化，不如说它扮演着一个社会化的角色（a socializing role）（通过一个多样性的网络）。”^[34]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是与相应社会的构成性的生产关系相一致的，空间在与之相一致的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结构中被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出来。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并不是探究空间的起源和本质，而是致力于对现实社会历史中空间问题的解释和研究。他认为，对社会历史发展和某一具体社会的认识取决于对空间的批判性分析，而对空间的批判性分析就是解码空间生产的历史。

第三节 空间的历史：人类“史前史”的空间图绘

如前所述，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的历史严格界定为资本积累的历史。那么，他所谓的空间的历史仅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形成、建立到衰退和消亡的特定历史时期。但是，他指出，对空间历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这一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阶段，必须面对人类历史的整体。空间的生产具有追溯力，通过回溯之前历史中的空间能够重新发现由过去的历史所产生的空间的产生的历史，并通过前进达到对空间生产的整体性的理解。因此，列斐伏尔正是通过“回溯-前进”的方法，在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中考察每一个新的空间的产生和发展的。而且，他认为，在西方，空间的历史取决于城市的历史，城市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空间形态，城市的组织是解码空间生产的钥匙。

一 从自然空间到绝对空间：古希腊罗马的城市秩序

空间最初的形态当然是生物形态的自然空间，并且自然始终存续其中，作为“第二自然”的社会空间发展的见证人。绝对空间就起源于是以地点定位的自然碎片，“绝对空间的摇篮——它的起源，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术语的话——是农业-农村生活空间的碎片，是被农民或者游牧的或半游牧的牧民命名和开发的一系列地点。”^[35]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绝对空间。在这一西方文明的初始阶段，人把自身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人嵌入自然之中并依赖宇宙的力量。对于每一个自然现象或自然中的事物，人都是用生命经验来构造它，像生命面对生命那样体验它。实际上，自然对人来说不是“它”而是“你”。对古代人而言，自然不仅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更是处处充满了神秘力量的生命有机体。自然在人那里是最伟大最神秘的空间，自然的一切都显现为神秘的和神圣的特征。于是，在最初极端的情况下，一个石头或一个洞穴就可以是标示绝对空间的地点。在遥远的古希腊，绝大多数人是根据荷马用人的形象描绘的神的意愿解释事件的，但不管荷马史诗中的众神有多大力量，都要服从叫作“命运”的力量，这暗示着自然中有一种严格的秩序，因此，古希腊人对自然秩序的崇拜和遵从成了“与生俱来”的。后来，宗教和城邦国家利用这种非教条的“教导”方式，把人

们经验中的神秘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宗教和政治的力量，维护着城邦国家的存在及其合法性。

因此，绝对空间由神圣的或被诅咒的地点构成。列斐伏尔提到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及的某个意大利小镇中部的一个坑。最初它只是公共垃圾场，各种垃圾和废物投掷其中，也包括被父母丢弃的婴儿。于是，这个坑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它连接地上的城市空间和地下的神秘的阴间，连接开端和结束、生和死（后来，在基督教时代，公墓有类似的功能）。坑也代表通道，死亡的灵魂能回到地球的核心然后重生。作为时间的场所，出生和坟墓的场所，作为地球母亲的阴道，作为从深渊中出现的黑暗的通道，向光明敞开的洞穴、隐秘的力的入口和影子领域的入口，它既恐怖又荣光。在它的模棱两可中，包括最污秽的和最纯洁的、生和死、生殖和破坏、恐怖和迷人。”^[36]它之所以已经不是自然的空间是因为它的自然属性和唯一性被宗教和政治的力量剥夺，自然的地点被赋予意义，成了代表宗教和政治力量的符号。随着祭祀阶层和僧侣阶层对绝对空间的管制并使之服务于政治权力，最初的空间形式具有了物质内容，绝对空间发展为通常是划定一个范围并具有特定的富有意义的空间形式。比如陵墓就是在这种坑基础上形成的绝对空间，它一方面表现为美的形式，是受尊敬的空的纪念物；另一方面又代表恐怖的政治内容，是闹鬼的地点。

然而，绝对空间不是地点和符号的集合，而是整个社会的空间秩序，社会中的一切按照这种地点被定位、感知和解释。列斐伏尔认为，被政治权力赋予意义的地点成为社会的中心，继而城市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一进程同时表现为城市和周围环境关系的矛盾运动。政治的和宗教的中心与它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表现为城乡冲突，一方面城市吸收农村社会的剩余产品，为农村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管理职能对农村进行攫取。农村一方面作为城市的附庸和受保护者，另一方面农民、牧民又反抗城市作为中心权力的压迫，总是城市潜在的征服者。但是，在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城市和农村还没有绝对的裂隙，它们是统一的。中心和周围环境是共同体，它们作为整体表达着城市国家的空间秩序，“在这种空间中，没有‘环境’，确切地说，甚至没有区别于整个肌理的任何‘地点’。”^[37]城市国家必须通过绝对空间所支配的空间秩序得以理解。古希腊城邦的组织就体现为这样一种绝对空间的空间编码。

古希腊人用心灵感知空间，把木头、石头赋予意义，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古希腊的圣所是身体的延伸，自然的变形、身体的变形代表和象征着神、英雄、国王和领导者。因此，古希腊的绝对空间仿佛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比如著名的帕提农神庙，然而它不是空洞的，而是被赋予了意义的，通过一个象征性的中介变成了政治领域，成了神和思想的秘密居所。

古希腊的绝对空间体现着希腊哲学的“统一”观念。绝对空间的大小、容量是经过仔细测算的，是宇宙的浓缩，是最完美的人体比例的展现。希腊人所发明的“秩序”就是结构自身，古希腊建筑的形式已经被结构赋予，形式和结构彼此包含并揭示对方，结构又与功能完全适应。于是，建筑和艺术实际上是一回事，形式、结构和功能是统一

的。列斐伏尔认为，古希腊的绝对空间一方面体现政治和宗教的融合，一方面体现数学理性，达到了高度象征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同一，达到了宇宙秩序、城邦秩序和建筑秩序的统一，也就是自然空间、政治空间和都市空间（都市空间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在表征城市规范的意义上）的统一。然而，这种**内在统一的永恒之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封闭**。因此，正如尼采所说，古希腊文明的完美神话为它的衰败指出了道路。

与之不同的是，古罗马打破了这种内在的统一，在古希腊空间中引入差异、相对和不同的目标。罗马的绝对空间不像古希腊那样表现为“空”，而是被物和客体占用和填满，比如集会场所包括国家纪念碑、讲坛、庙宇和监狱等。罗马把城市重建为一个生产性空间（productive space），根据社会需要组织空间秩序，“在古罗马，需要已然成为一个几乎是总体性的决定因素：浴缸和住宅都要符合每一个自由而富有的市民的身体和想法的要求。”^[38]通过外在控制而不是内在统一的方式，罗马实现了空间的多样性，从而促进了社会空间的进一步发展。

列斐伏尔认为，罗马与古希腊的绝对空间有所差别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兴起，需要把土地按照抽象原则进行分割，这种抽象原则既统治私有财产也支配私有财产持有人的地位。”^[39]罗马通过父权控制土地、私有财产等使抽象的思维逻辑引进城市秩序的重建中并成为其先决条件。从母权到父权的转换，罗马把空间重建为权力的空间，不是按照逻各斯，而是通过罗马法、法律的观念、司法和道德的观念、父权的观念把符号的逻辑强加于自然之上，一方面，把城市、地球和世界构想为一个庞大的整体，另一方面，通过一种空间实践的直觉（intuit），也就是被空间的表象动员起来的空间的实践把空间的表象转变为一个具象的空间。在罗马的具象的空间中，女人、孩子、奴隶、仆人都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自有市民和政治士兵的空间则体现为不同的秩序，比如军营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工具空间（instrumental space）。

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所具有的双重特征概括了罗马精神和罗马的空间组织。就空间的实践而言，一方面，通过道路连接都市和乡村，形成了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对乡村行使统治权的公共空间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司法的建立形成了政治社会的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的秩序。就空间的表象而言，一方面，地球、城市、循环延伸为拱门、拱顶，循环、统一的空间概念尚保存；另一方面，军营被建构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分隔的空间概念被强化。就具象的空间而言，一方面，男权、军事、专制、司法的领域占主导，公共生活是男人最高贵的活动；另一方面，女人被限制在家庭生活中，女人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被贬低，女权衰落。

无论罗马与古希腊绝对空间的建构原则和具体形式有多么不同，它们的绝对空间本质上都是宗教的和政治的空间。在这种空间组织中，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的，彼此蕴含其中并在对方中发现自身的意义。在古希腊，城邦公民的“时间、每日和节日的节奏与空间的组织是一致的，也就是与每家每户的供桌、集体活动的中心、自由开放的

公民集会、庙宇和露天体育场是一致的”。^[40]在罗马，贵族和富有的市民都虔诚地过着宗教的和政治的日常生活。“他的火是神，围墙、房门、门槛都是神，环绕他土地的界标也是神。坟墓是祭坛，他的祖先都是神。他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都是仪式，一整天都属于宗教。……他随时随地都是一名祭司，而且他的思想专注于神。爱国主义、热爱荣誉和喜爱金钱不管在他的心里分量有多重，对神的畏惧仍然支配一切。”^[41]

因此，绝对空间是人类在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空间，它既是精神的又是社会的，它的存在方式既是象征性的又是现实性的。一方面，这种宗教的和政治的空间之所以被称为“绝对的”，是因为它并不是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处所，“它没有处所因为它包括一切处所，并且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象征性的存在”。^[42]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列斐伏尔认为绝对空间是多维的，并特别强调了绝对空间从高到低的垂直维度。他认为，相较于水平维度而言，最重要的是天堂、人间和地狱三种等级的绝对空间。其中，人类生活并在其中建立规则的空间象征服从，服从于天堂和地狱。另一方面，绝对空间的“绝对”需要识别的标记，比如由神圣的或被诅咒的正方形、三角形等空间形式和庙宇、宫殿、坟墓等具体的地点。绝对空间并没有随着农耕社会的衰落而消失，它的具象的空间幸存下来，并且在每个社会中，从神圣的处所到最小的庙宇或最不起眼的教堂，绝对空间都承载着意义。因此，绝对空间是“经验的”而不是“概念的”，是“具象的空间”而不是“空间的表象”。

二 从神圣空间到世俗空间：中世纪城镇是“抽象空间”的摇篮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还只是罗马帝国内部的诸多教派之一，但与当时的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是更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宗教，它不仅向被剥夺者承诺一个美好的来世，而且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团体，不只在形式上通过共同的仪式“成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物质帮助，并使基督教徒获得归属感、尊严感和令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有意义。到了4世纪，基督教最终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于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基督教服务于城市国家。随着日耳曼民族的入侵，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教会却得以幸存，教会组织不仅保留了它按照帝国行政区域划分郊区的特性，而且，“从六世纪起，城市一词具有主教管辖城市即主教管区中心的特殊含义。”^[43]逐渐地，主教、牧师、修道院所占有的土地超过皇室和不同阶层的自由业主所占有的，终于在10世纪末，教会战胜皇权居主导地位。在这过去的近千年当中，尽管政权更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文明的衰败，但基督教却成功地介入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促进了西欧中世纪初期封建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而且，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对地中海贸易产生太大影响，地中海沿岸地区继续保持过去几个世纪中在帝国共同体内形成的经济统一。旧的城镇得以保留，新的城镇将在其基础上出现。因此，列斐伏尔并不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认为日耳曼人的入侵造成了罗马文明和西方中世纪的断裂，他向我们描述说：“在帝国的晚期或中世纪的早期的被认为是空的时期，一种新的空间

被建立起来，取代了罗马的绝对空间，并使这一宗教的和政治的绝对空间世俗化。这些变化对随后出现的一个历史空间（a historical space），也就是积累的空间（a space of accumulation）的发展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44]

在列斐伏尔看来，无论基督教经历怎样的沉浮，它都是一个“编码”死亡的宗教，通过隆重庆祝死亡的仪式化秩序把人们引向被死亡神秘化的物，比如墓穴、圣坛和遗迹等。基督教教会严格控制对宗教利益集团的质疑，通过宗教思想的压迫，西欧成了“死亡的符号的空间”、“绝望的凝视的空间”、“禁欲主义的空间”。因此，伴随着千禧年的到来，当教皇想要通过建立基督教国家来代替帝国国家时，商人贵族深深扎根于封建社会之中，商人定居的新型城镇已经出现，空间已经被改变了。“根据最新调查，11世纪在法国西部除了罗马城市外，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城市中心。……英国也同样有一大批罗马城市在中世纪焕发了新颜……与此同时，法国的瓦兹盆地（Oise basin）也在经历一场深远的变革：据说商人和高利贷者此时在里昂、苏瓦松（Soissons）、莱姆斯（Rheims）、森里斯（Senlis）、努瓦永（Noyon）出现。”^[45]，此后，中世纪人在自由价值观的感召下，采取宗教的以及城市和乡村的自由民和农民造反的方式来拒绝承认权威的不可挑战，12世纪，基督教的神圣空间受到了阿伯拉尔（Abelard）等杰出人物的质疑和颠覆，伴随着重视理性与经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复兴，中世纪城镇的组织逐渐恢复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传统。最终，中世纪的商业城市秩序取代了基督教的神圣统治的主导地位。因此，列斐伏尔认为：“出现在十二世纪的空间，逐渐延伸至法国、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空间是积累的空间的出生地和摇篮。……这一世俗空间（secularized space）是逻各斯和宇宙原则复兴的结果，这些原则能降低‘世界’及其神秘的力。与逻各斯和逻辑一起，法律也被重新建立起来，契约关系代替了习俗。”^[46]

从死亡的符号的空间和无人身的空间中解放自身，并吸收罗马空间和基督教空间的遗产发展自身的世俗空间，一方面继承了基督教的劳动禁欲主义的宗教思想，把恐惧来世的谴责转化为努力实现现世的物质繁荣的“善功”。另一方面，除了道路、水渠等公共设施外，世俗空间继承了罗马的空间概念和抽象原则，也就是形式、结构和功能的分离及其实践结果的多样化空间的表象。另外，更重要的是保留了罗马的最有价值的成就，即私有财产的权利。在中世纪的城镇中，“私有财产原则通过统治空间，终结了仅仅是注视自然、宇宙或世界，并指出了掌控也就是改变而不仅仅是解释自然、宇宙或世界的道路。”^[47]随着货币和商品的发展，中世纪城镇被组织为一个“交换和交流的空间”（a space of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s）因而是“网络空间”（a space of networks），把产品和货币的“交换者”紧紧绑在一起，并产生了劳动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预示着“集体工人”（collective worker）的出现，他们为中世纪的城镇进行生产。

总体来说，列斐伏尔认为，中世纪城镇的社会空间是多重的，宗教空间、交换空间、权力空间等交织在一起，虽然由于市场的发展导致了抽象的商业时间的出现，但这种时间总是不时地被在空间中进行庆祝的节日的时间打断。因而，尽管交换空间有

打破自然节奏的趋势，但时间和空间还是不可分的，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虽然分道扬镳，但整体的统一尚未被破坏。尽管“物”的生产与交换作为一种反对崇拜圣象的力，对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发轫于 10 世纪，经过 11、12 世纪的兴起，13 世纪的经济繁荣到 14、15 世纪衰退、瓦解的世俗空间，由于入侵、内战、疾病等引发了多重苦难，暴力、恐怖和革命始终是中世纪城镇的典型社会问题。

三 从历史空间到抽象空间：正在形成中的都市社会

物的贸易、货币、科学思想和知识并不是新近的产物，也不是中世纪才有的，早在西方的古代就出现了作为资本积累的这些前提条件。然而，列斐伏尔认为，积累的进程并没有从此开始，中世纪城镇也只是积累的出生地。资本积累真正开始于 16 世纪。这与马克思的判断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 16 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48]列斐伏尔的分析异曲同工，他从都市社会的变化角度揭示了这一特殊历史进程的开端。他把 16 世纪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元，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某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或者单纯用经济尺度衡量的标志性进程，而是认为社会经历了整体性的变化，土地所有权失去了以前的绝对首要地位，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战胜了乡村，西欧社会正处于一个分水岭上。“只有在十六世纪，在中世纪城镇（建立在商业基础上，不再以农业为特征）兴起之后，并且，在意大利、弗兰德斯（Flanders）、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Spanish America）和其他地方的‘都市体系’（urban systems）建立之后，城镇才作为统一的实体和主体。”^[49]列斐伏尔作出这个判断并不仅仅基于城镇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战胜了乡村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而更重要的是城镇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成了一个“主体”。本书在论述生产概念时讨论了自然的创造和人类社会实践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使用的“有机体”概念隐含着一种盲目发展的含义，比如自然空间中的生命从出生到消亡，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种无目的的创造性过程。然而，列斐伏尔认为，处于都市体系核心的城镇已经与作为“没有目的的目的”的古代城市不同，它是一个积累的“主体”，有目的地进行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言：“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50]

围绕着资本积累，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不再是使社会生活永续的因素，而是逐渐独立于这一再生产过程，于是，劳动变为抽象社会劳动，空间演变为抽象空间。列斐伏尔认为，从中世纪城镇到都市体系的建立是空间的第一次抽象过程。伴随着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兴起，都市空间（urban space）注定成为衰落的封建体系、商业资本主义、寡头统治的国家和手工业者群体之间矛盾调节的场所。这是一次“积极的抽象”，整合具体甚至发现具体。在这次空间的抽象进程中，都市空间

征用自然并行使对生产力的统治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在从商业和投资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换过程中，都市体系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在国家和政治权力的掌控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进入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下的和空中的资源，甚至光都既是生产力又是产品。具有多重交流和交换网络的都市肌理是生产资料的组成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是资本组成部分。”^[51]空间完成了第二次抽象。

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生产了抽象空间，这期间暴力的作用功不可没。他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之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认识到暴力处于资本积累的核心。其实，从12世纪到19世纪，暴力一直都是城镇空间生产的“生命线”，它不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力，用光财富，战争和军队还在资本积累中扮演了生产力的角色，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为了争夺潜在投资区域而战的战争本身是最大的投资和最有利可图的。”^[52]并且，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暴力已经发展为资本积累、官僚管理、军队统治的理性的统一体，抽象空间正是这种理性的暴力和战争的产品。显然，孕育于12世纪的积累的空间还没有完结，但列斐伏尔坚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灭亡，抽象空间在自身中播下新空间的种子，人类将走进崭新的历史。也就是说，具体“缺场”、价值缺失、建立在等价原则基础上趋于同质的抽象空间不会终结人类的命运，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类通过不断与这种悲剧命运抗争，最终摆脱“城市动物”式的模式化生存，真正占有空间，以差异取代同质，建立一个“超越瞬间、超越孤立的人和物，使人浮想联翩的社会世界”^[53]。

在这部分内容里，本书只简单勾勒出列斐伏尔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轮廓，而没有详细阐述抽象空间和差异空间。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的分析是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核心所在，也是他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的深化，所以，本书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抽象空间的生产机制，以及它的特点和矛盾性作详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才能再进一步探讨列斐伏尔对差异空间的追求。

四 空间化历史分析的意义

以西欧城市空间秩序的构建为主要线索，列斐伏尔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城市、中世纪城市和文艺复兴城市兴起之后的都市社会的分析，展示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平线上出现，经历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绝对空间、封建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世俗空间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抽象空间的历史。熟悉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人会发现，这一人类历史的空间绘图清晰地带有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的印记。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和深刻的批判，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和未来走向，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和各个发展阶段进行

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列斐伏尔深谙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尤其深入研究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他坦然承认，他关于“积累的空间”的分析受惠于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但他认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待进一步深化。于是，他提出通过对空间的生产的历史进行分析来理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通过社会空间发展的整个历史达到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整体性理解。而且，这种他所推崇的“回溯-前进”的方法也得益于马克思，他认为这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54]中已经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把社会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纯粹私有制”（或“现代私有制”）四种所有制形式，并得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55]的观点。随着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的不断深入，马克思把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分析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上，并以此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他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6]列斐伏尔显然注意到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经历了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分析到生产方式分析的转变，并且，他认为，正是基于生产方式的分析导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裂，社会结构分析偏重经济方面而使后人产生了经济主义的误解。他所提出的空间概念和空间的生产的分析方式在他看来正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的一种完善。

综观社会空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列斐伏尔论证了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时将伴随着新空间产生的观点，并且，**新空间是在“破译”旧空间中战胜旧空间，通过解放自身获得提升。**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城市国家以及逻各斯和罗马法建立起来，**绝对空间以自然空间为基础**，使人们对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拜打上了宗教的和政治的烙印而取代了自然空间；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的生产方式过渡过程中，**罗马的以父权制为特征的绝对空间被基督教改造为神权至上的神圣空间**，加强了对人的思想的禁锢，与此同时，世俗空间恢复了逻各斯和宇宙原则，解放了人的身体，交换与交流的空间与宗教空间和权力空间交织在一起，成为产生于封建主义消亡和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文艺复兴城市的摇篮；随着交换空间的发展和普遍的都市化，抽象空间被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建立起来，这一时期，虽然抽象空间接替历史空间，然而历史空间仍然存在，古代空间的表象崩溃了，但具象的空间以历史遗迹等形式保留下来。现在的都市空间一方面包括神圣的地点，也就是保留下来的以往的具象的空间，另一方面受国家统治，是理性的空间，是各种交易系统即符号系统的空间。

如果从空间生产的三重辩证图式中理解社会空间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城市构造中，“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是辩证统一的，城市具有形而上学特征，是宇宙的中心和缩影，真善美的统一。随后，“空间的实践”、“空

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经历了一个逐渐分裂的过程，就“空间的实践”而言，分离的概念逐渐被强化，劳动变成了抽象劳动，生产和创造分裂，城市逐渐变成了财富积累的中心，成为一个暴力统治的战场和虚假“主体”。就“空间的表象”而言，随着近代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科学的确立，整体的空间被切割、瓜分，空间具有几何特征。时间和空间的分裂是“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分裂的结果。时间从空间的内涵中被剥离出去，与商品生产、运输、销售、配送相适应，成为这种空间实践的计量尺度。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种计量时间还受到空间的限制，商品运动、资本流通以具体的场所为前提条件。就“具象的空间”而言，在自然力经由父权和家长制到生殖崇拜和权力统治转变的过程中，视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具象的空间”由古代的神圣地点变为权力的象征和符号，经历了从隐喻到转喻的转换。如果我们从身体出发理解社会空间的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空间从主客体统一的身体逐渐变为与客体对立、试图征服客体的主体，并在国家和政治权力统治下成为权力的傀儡、虚假的主体。“它的真正形式源自男性统治原则，具有暴力和对战争热爱的特征；这种原则反过来被所谓勇敢的美德强化，被内在于受控的和施控的空间中的规范来推进。”^[57]

从列斐伏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空间的起源和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紧密相连。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空间的生产中起作用，空间是其矛盾运动的场所和结果，也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工具。空间不仅是生产资料，也就是生产力要素，也是一种内在于所有权关系的生产关系。同时，空间还是上层建筑的前提条件和结果。因此，列斐伏尔把空间作为一个整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性概念，以空间分析代替生产方式分析揭示社会结构的复杂机理，马克思所描述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被列斐伏尔呈现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形态。而且，他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空间绘图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并不矛盾，可以说他所描绘的从“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到“差异空间”的社会形式正是从空间的生产视域对马克思从“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自由个性”的三大社会形式的解读。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列斐伏尔从城市社会、建筑和身体等微观层面入手进行的空間化的社会形态分析对马克思所作的宏观历史考察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其实，列斐伏尔使用空间分析的真正贡献是对马克思没能正确预见的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深刻理解，这才是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通过对空间概念历史变迁的批判性分析指出，由于理性的简化原则和知识的过度分化使原本与时间统一于历史中的空间变成了一个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自在的精神空间。而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把空间和时间重新统一起来历史性地理解空间，反过来，这样做的目的也是通过空间的转变深刻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变迁。因此，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一个与生产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他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这意味着社会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的历史性进程及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中每一个社会形态或每一种生产方式生产它自己的空间，也就是说，社会的更替或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产。基于这种理论假设，以西欧城市空

间秩序的构建为主要线索，列斐伏尔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城市、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城市，以及在其基础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现代都市的分析，描绘了人类挣脱了自然空间的“朦胧”同一性之后，经历的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绝对空间，从封建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世俗空间以及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抽象空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关于人类历史的空间绘图，正是以城市变迁为线索，从微观层面入手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形态宏观考察的精彩注释。在随后开展的空间生产的分析中，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的历史严格地界定为资本积累的历史，通过对抽象空间的生产机制及其矛盾性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在空间层面所作的调整，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域。

[1]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 18 页。

[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2.

[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2.

[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2.

[5] 转引自〔美〕爱德华·索杰《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 200 页。

[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412.

[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04.

[8] 包豪斯建筑学派（Bauhaus School）是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以包豪斯为基地形成与发展的建筑学派，以格罗皮乌斯为代表人物。此学派注重空间组织、设计和规划，强调建筑形式、功能和结构的统一效能，主张将建筑的美学价值、建筑的目的性、建筑材料联系起来。

[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24.

[10]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25.

[1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93.

[1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8.

[13]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

民出版社，1995，第22页。

[1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3页。

[1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68.

[16] 〔法〕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页。

[17] H. 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18] H. 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5页。

[19]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pp.30-31.

[20]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8页。

[2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71.

[22] H. 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188页。

[23] H. 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193页。

[2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6.

[2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0.

[2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1.

[2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6.

[2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46.

[2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17.

[30]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29.

[3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74.

[3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171.

[33]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区分了物质（materials）和材料（matériel）。物质是不可分的和持久的，比如音乐的风格、音调；材料是被消耗且因其适应能力有限而必须经常替换的，材料包括工具，比如音乐中使用的钢琴、萨克斯管。

[3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p.190-191.

[3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34.

[3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42.

[3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40.

[3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39.

[3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40.

[40]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47.

[41]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The Ancient City*. Trans. Williard Small, Boston: Lee and Shepard, Publishers, 1874, pp.281-283. 转引自〔美〕丹尼斯·舍尔曼《西方文明史读本》，赵立行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76~77页。

[4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36.

[43] 〔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7页。

[4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53.

[45] 〔英〕M.M. 波斯坦、E.E. 里奇、爱德华·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周荣国、张金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12页。

[4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63.

[4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53.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

版社，1995，第 166 页。

[4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71.

[50]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479 页。

[51] Henri Lefebvr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87.

[5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275.

[53] 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 91 页。

[54]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巴师夏和凯里》、《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的通称。

[5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67～568 页。

[5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3 页。

[5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409.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幸存与“空间的生产”

众所周知，马克思基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最终是要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种生产关系必然变成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的桎梏，资产阶级社会伴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而终结，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取政权，经过一段专政时期，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的理论没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历史现实中成功地再现。自《资本论》写作以来将近 160 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还成功地实现了“增长”。面对如此大的变化，无论是出于改造世界的需要还是解释世界新变化以确立革命信念的需要，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继承马克思的遗产，积极地寻找破除资本这种“失控的幽灵”所设符咒的途径，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幸存的理论阐释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列斐伏尔基于空间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无疑是这异彩纷呈的理论景观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生产”出一系列的概念基础上，成功地分析了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但是，《资本论》是“从交换价值和社会劳动进而讲到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基于剩余价值学说的（未完成的）关于生产的理论”。^[1]自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实现“增长”的手段是“占有空间”（by occupying space）和“生产空间”（by producing a space）。因此，空间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幸存的秘密所在。列斐伏尔试图用“空间的生产”理论来完善他所谓的马克思的未完成的生产理论。“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建构性的生产（人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得以展开的基础，并为理解历史的真实发展提供了一个科学平台。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现代哲学的开端，那么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开端则可以概括为‘我们生产故历史在’。”^[2]如果是这样，那么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可以概括为“生产空间故资本主义历史继续在”。

第一节 资本界限的激活：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

马克思主张从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出发来对这一社会进行“解剖”，他在《神圣家族》中第一次使用了“生产方式”概念，在这部著作中他发出诘问，“难道批判的批

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3]因此，要求马克思的分析完全符合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列斐伏尔正是遵从马克思的教导，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问题框架内，从分析 20 世纪新资本主义的直接的的生产方式出发，来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他的空间批判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之前所作的批判，而是通过使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再生产等概念重新焕发活力，并引入新的概念来试图把马克思的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一 马克思的遗产^[4]

如前所述，列斐伏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结为一种“（未完成的）关于生产的理论”。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是从生产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生产概念是这一分析的问题框架；二是在列斐伏尔看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还应该在这一问题框架内，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并进一步完善生产理论以实现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因此，本书在这一节中首先以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为理论前提，试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所作的分析中揭示马克思留给列斐伏尔的遗产，并找出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已经提示给他的重要线索。

（一）遗产之一：生产是资本逻辑的核心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是表征人类的社会历史性生存的基本范畴。生产不仅是人类本质力量确证的一个基本活动，而且生产过程也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5]，就必须首先面对“摆在面前的对象”，即“物质生产”。这也是为什么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主义仅从货币和交换价值层面理解资本主义矛盾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只针对货币本身，只把商品或劳动视为交换价值，“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6]。而且，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社会形式中都有特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并且这种特定的生产的关系决定其他一切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就是这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资本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维系和巩固自身，并把一切卷入物的体系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认了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7]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资本决定了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上层建筑，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始终致力于讨论和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

作为一个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从本书第二章对列斐伏尔空间概念的阐释中不难看出他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重视。而且，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历史的分析也不可能不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分析中获得灵感。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从来就不是自在地游离于社会历史之外的抽象物，它必然与特定的生产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来说，生产实践或生产方式是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理解和分析空间的基本视角。这也就是为什么列斐伏尔始终是在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再生产等“家族”范畴中来审视空间的缘由。虽然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及其支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揭示了竞争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并窥探到了资本自身运动的秘密，从而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列斐伏尔显然不能同意马克思基于物的生产的分析就穷尽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他提出用“空间的生产”来拓展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认为：“它不仅仅依靠物的生产和工作，不仅仅依靠物的生产的（双重）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利用自然作为它的‘原材料’，将吸收空间和时间并扩宽生产概念，以至于包括空间的生产作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产品——空间——本身包括物（商品、客体）和工作。”^[8]

（二）遗产之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渗透着总体性和历史性原则

与后来一些倾向于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绝对化的思想家相比，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方式无限地抬高到“绝对”的地位而扼杀其生命力。相反，生产方式始终是被历史地加以审视的。这是因为，历史和生产方式具有同一性，历史就是生产方式的表现。“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9]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必然离不开对它的表现“形式”的考察，反之亦然。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性质，“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正因为把生产方式作历史化的理解，马克思才可能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此以及未来会如何，才可能基于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对生产方式的理解又退回到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中，就会导致像蒲鲁东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体系，更别提无产阶级革命了。所以马克思一再严厉地批判把生产方式变成僵化的概念的做法。但是，如果仅仅对生产方式作历史性分析，那么结论便可能是一些对不同社会形态进行描述的零散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如果缺乏一种总体性原则，它们便只具有史料价值。很显然，马克思构建了某种总体性原则来统摄这些材料并挖掘出其中的内在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断矛盾运动促使社会形态的演变。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也必须置于这些抽象范畴及其矛盾关系中。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的宿命在于无法逃避这些基本规律，最终的结果是一场总体性革命。总之，历史性和总体性构成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不可或缺两种原则。

列斐伏尔特别重视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性原则，他认为，马克思恢复了历史性时间，而且“把历史性时间恢复为革命性时间”^[11]。这种“时间概念是，历史性被生产力驱使，并被工业、无产阶级和革命理性引领着方向”^[12]。正是对历史性原则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是欣赏），列斐伏尔才没有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空间等概念放入某类实证科学中。相反，他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来考察现象和概念，尤其是社会空间。只有通过对空间的历史化考察，才可能精确定位资本主义空间，也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指出：“如果空间也许真的能基于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被详述，那么就有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空间这么一回事。”^[13]如果存在“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空间”（实际上是存在的），那么就有一种新的社会批判以及由此导向的革命。同时，列斐伏尔深知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原则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他看来，如果仅仅注意事物的存在，就必然会对事物所包含、显现和遮蔽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当不听从社会关系内在固有于社会事实中的劝告，那么知识就会脱靶；我们的理解力就降低到对未定义的和难以确定的事物的多样性的证实，迷失在分类、描述和分隔中。”^[14]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注意琐碎事实和看似单独存在的物背后的总体性关系，这种关系才是最为根本的。基于这种见解，列斐伏尔分析了新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现象所显示出来的总体逻辑和由此导向的“总体性革命”。这种逻辑既表现为生产关系再生产和空间的生产，也表现为矛盾的生产。但他也注意到了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原则所带来的问题。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了区分，但这种区分仍不明确和自觉，甚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经常被混为一谈。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的统摄下始终未能明确出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切关系也未能被完整地揭示。这些问题多少影响到对资本主义幸存的总体性分析。

（三）遗产之三：二元对抗性的辩证方法与资本主义结构的三位一体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是以一种二元对抗性和辩证性的模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揭露的，其中资本和劳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润和工资等的二元对立构成了这种二元模型的主要内容。二元对抗性模型能够切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并清晰地分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但它“暗含着将历史降低到经济的从属位置，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概念领域，构成的多样性被经济领域同化吸收”^[15]。而且，它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第三个方面，即土地、地主阶级、地租和农业这些要素。从最现实的层面来看，土地所有权没有消失，土地所有者的政治地位没有消失，农业生产的独特性没有消失，地租也没有消失。而且相反，土地以及地上和地下资源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正因如此，马克思虽然没有完全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资本和工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上，在《资本论》的最后，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土地、资本、劳动三个要素

的相互关系，“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公式。”^[16]

列斐伏尔非常重视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概括成土地、资本、劳动的三位一体的观点，他认为对现存社会的考察必须从马克思的这一公式出发，彻底分析生产关系的更新。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应当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理解，不仅指货币和商品（资本的先决条件，由资本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所导致），也不仅指工资和利润（剩余价值），而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关系。”^[17]不过，他并没有把土地仅仅局限于自然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所讲的土地不是简单地指农业，它更广泛地包含着民族国家和领土，甚至“政治活动和政治战略”。简言之，土地具有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列斐伏尔为自己的空间批判理论找到了理论根基。他认为，为了理解现存社会就必须以马克思的“三位一体”理论作为“基点和支点”。这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三种要素不可分地与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现存社会幸存的秘密也存在于这三种要素的关系中。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放弃了马克思的二元对抗模型。二元性意味着矛盾和冲突，忽略矛盾，也就不可能抓住资本主义的根本。因此，他依然熟练地运用着二元对抗的表达方式。在列斐伏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关于同质和碎片、中心和边缘、具象和表象、内部和外部等之间的矛盾分析。

二 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凸显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8]在列斐伏尔看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概念在马克思精心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时已经有所显现，但马克思从未完全解开这个谜团。他认为，尽管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理论，并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但马克思仅仅证实了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不断更新的结果”，再生产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他对资本的分析还停留在《共产党宣言》时期的认识程度。他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9]也就是说，商品普遍化为商品世界，资本在商品世界中再生产自身。于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分析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再生产自身。由此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教条式理解，从而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列斐伏尔指出：“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生产方式便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由于关涉到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自从在认识论和理论中被首次提出，它便无所不在，同时，它已经排除和征服了所有其他概念。在完全科学的名义下，它被小心翼翼地培植起来。它代表总体性，它先在于它所包含的，包括社会关系。”^[20]列斐

伏尔认为在结构主义者那里，这种倾向最为明显，他批判了阿尔都塞把生产方式和“系统”混为一谈，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从一开始就是完善的系统的做法。他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把资本主义的各种要素还原到一个静止的僵化的结构里，从内部分析变化，把生产方式强加于生产关系之上，从而也就取消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默认了资本主义秩序。列斐伏尔举了都市现象的例子，他认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都市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城镇是作为生产单位的“补充”的消费单位，它与生产单位（比如企业）一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城镇在其中的作用，也就是消费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此一来，结构主义就通过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还原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规避了真正的问题。

在列斐伏尔看来，结构主义未能勾画出资本主义重建自身的深层历史图景，资本主义幸存的秘密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把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城市碎片化并整合进一个更广阔的都市空间中而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更新，资本主义得以存续。列斐伏尔认为，要发现这一问题必须集结各种专门化的学科，尤其是要深入到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其实，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都市问题已初露端倪。19世纪的法国虽然仍是“历史城市”，但已经遭受大规模的工业和资本的冲击，巴黎已经开始经历城郊化和边缘化的进程。只不过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大城市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然空间中建立起来，还没有实质上改变自然空间。所以，对他们来说生产规模仍然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实质和核心的问题，空间还只是作为一切生产场所、各种市场的地盘而存在。然而，资本的生产不可小觑，正像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从而，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革，与此同时，在国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灵活性”^[21]。列斐伏尔认为一个世纪之后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种新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a capitalism of organization）。他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段时期的特点是，第一，伴随着休闲空间和假期的确立，经济增长呈现在地理空间上增长不均衡的现象，形成了以一个增长中心来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态势。第二，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成为对这种“空间集聚”意义上的增长进行政治控制的意识形态。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增长极核”理论，后经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B.Boudeville）、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受到区域经济学家、区域规划师及决策者的普遍重视，不仅被认为是区域发展分析的理论基础，而且被认为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到了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明确提出城市就是一个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增长中心，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和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组织作用。“增长极核”理论已成为培育和发展城市的理论依据，各国都积极倡导培育中心城市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第三，

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再是简单地积累财富和生产工具，而是积累技术、信息和知识。技术、信息和知识一般在发达国家已经直接资本化了。第四，工业理性扩展到全社会，企业的意识形态扩展到政党中，形成了官僚结构，成为这种空间集聚的有力且有效的工具。第五，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空间的组织、休闲工业的发展和假期等生活方式的出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了。总之，新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在一条更为广大、更为多样化、更为复杂的战线上进行**自我防御**，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不再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同步；它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和文化来实现，通过学校和大学来实现，通过古老的城邑的扩张和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的空间来实现”。^[22]因此，问题转移了，由对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对整个空间的生产。当然，空间的生产包含空间中物的生产并以之为前提。空间成了战略性的，于是，列斐伏尔断言，“空间的问题框架，它包括都市领域的问题（城市和它的延伸）和日常生活的问题（消费的被规划），已经取代了工业化的问题框架。然而，新的问题框架并没有破坏早期的一系列问题：以前的社会关系仍然适用；确切地说，新的问题是，它们的再生产问题。”^[23]

三 空间的“同质性-碎片化-等级化”

从对空间的实践分析中列斐伏尔发现，在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分析中隐含的图式对于空间同样适用，“这种空间被现行的生产、再生产和支配关系生产出来，这种空间显现为‘**同质性—碎片化—等级化**’的图式。”^[24]因此，资本主义的空间的生产与抽象劳动的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中具有重要作用，空间问题是理解新资本主义的关键。

（一）同质性

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承担了交换的形式和货币的形式，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具有基础地位。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同质性特征。“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说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25]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空间，比如，道路、桥梁、机场、公路、城市、建筑等也日益具有无差别的同一的趋势，这种同质化的空间实践使前资本主义的多样化的历史城市变成了闪烁着几何光芒、充斥着以视觉为主导的景观和符号、展现着以生殖崇拜为特征的权力^[26]的都市化的抽象空间。并且，这种同一是世界性的，比如迪斯尼乐园、麦当劳、星巴克等在世界范围内被建立起来。无差别的同一并不等于相同，然而，颜色和形式的多样化等审美意义上的差异在列斐伏尔看来是一种“无效的差异”（futile effects of difference），资本主义的空间

的生产体现着“现代性”的一个最显著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特征，即“重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空间具有可再生和可再生产性。于是，这种同质性的空间与自然空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第一自然”创造出来的是因差异而稀有的作品，而被生产出来的“第二自然”越来越表现为因同质而增殖的产品。总之，空间的同质性与抽象劳动一样体现的是除去质的量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空间是可以基于量的关系进行交换的。空间的同质性趋势表明资本主义的交换原则渗透到空间的生产中，资本生产的空间结构的发展和重组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交换原则，实现着剩余价值的生产。

（二）碎片化

碎片化的特征在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劳动的碎片化与社会分工紧密相连，马克思曾对社会分工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27]在此，马克思揭示劳动碎片化的特征的目的主要是推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为论述社会分工的历史命运奠定基础。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复杂，这种碎片化不仅体现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上，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碎片化用于对空间的描述和分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空间像劳动一样，被分割成实践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行使不同的功能，比如劳动、住房、休闲、交通运输、生产和消费等。这些空间碎片既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说它们是虚构的，因为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这些功能的分隔，它是概念上的划分；然而，它们又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伴随着明确的任务和职责，所有的空间碎片和它们的功能都获得并保持一种自治，它是能够被亲身经验到的。除此之外，空间的碎片化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还表现为空间被分割成一块一块，严格地量化，以平方米和货币计量进行交换。这样，空间通过碎片化和可交换的存在方式与空间中的物一样成了商品，维持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三）等级化

空间的同质性和碎片化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空间处于等级制度中。就像劳动分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进而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一样。分割开来的同质性空间与其说被资本主义用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使用和满足不同的需求，不如说用来制造中心与边缘、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等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行政机关、银行和娱乐场所等权力中心、财富中心、休闲中心和信息中心等中心性的建立产生中心和边缘的截然对立，并且，这种中心和边缘的对立也体现在世界范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占支配地位的中心通过组织的、行政的、司法的、财政的和军事的方式统治边缘，保证空间在世界范围的同质性。另外，仅从住宅建设上就能看出满足相同功能需要的空间被分出等级。政

府对居住空间的规划既有被称为“公共住宅计划”的贫民区，也有为中产阶级而建的环境好一点或差一点的各自独立的别墅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具有等级化特征这个深刻的见解也启发了女权主义者。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男人和女人制造了不同的空间，空间的性别化体现着父权思想和等级制度的思想。琳达·麦克道尔（Linda McDowell）就曾经深入地探讨过社会性别、身份和地点之间的关系，她把家庭、消费、私人的领域视为女性空间，把工作、生产、公开的领域视为男性空间，从而揭示男性对女性的权威和权力。

列斐伏尔所描述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美洲城市（Spanish-American town）的建造是空间的同质性、碎片化和等级化组织的一个典型例证。“结果，一个严格等级化的空间组织建立起来，从城市中心逐渐向外扩散，一直延伸到周围的印第安村庄。这一计划伴随着几何的精确性：从市政广场向任何一个方向扩散。每一正方形或矩形的地点，比如，教堂、行政大楼、城门、广场、街道、港口、仓库、市政大厅等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功能，每一功能拥有自己的地点与中心广场保持或近或远的距离。从而，一种高度隔离的状态叠加于同质性的空间之上。**”^[28]总之，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的和政治性的空间在全球规模上再生产和加强了生产力与先进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所有权关系（尤其是国家和他们领土主权的关系）、组织形式（尤其是跨国公司）、意识形态（尤其是领空、信息的表象等）之间的地域性和国家性的联系。”^[29]在全球范围内的作为整体的空间的生产使资本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得以实现**，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生产关系的更新和再生产获得存续。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主张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组织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幸存。他认为，在新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的实践构成了社会实践的所有方面，空间的生产包含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和共同方向。“资本主义的航船和它的领航人发现自身有一个马达、一个舵和一条固定的航线。”^[30]列斐伏尔用这一隐喻表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政治权力与知识和技术合谋，通过建构起作为发展中心的**城市和都市社会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增长，剥削关系和异化关系被权力关系和对增长的依赖强化了，资产阶级正逐步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空间的战略和实践。**“今天，资产阶级当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与世界性的规模相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即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un capitalisme organisé）；然而，它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组织机构的资本主义（un capitalisme d’organisations）。这些组织机构，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根据其财政规划，成功地控制并维持了一个世界市场。”^[31]面对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及其问题的国际化，以及社会与空间之间的新关系，人类历史正在世界性的层面上展开，我们的时代正在世界空间的场域内被创造出来。

第二节 国家和政治权力是空间生产的“管理者”

空间的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而然的再生产，而是被构想的和深思熟虑的结果。空间具有政治性，它是政治统治的工具，空间的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空间与政治国家的关联比曾经的领土与民族国家的关联更牢固。它不仅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所有权生产；而且它是一种政治产品，具有行政和残暴统治性的产品、由政治国家上层统治关系和战略决定的产品。并且，这不是在某一政治国家范围内，而是在国际和全球范围内，在全球国家体系范围内的生产。”^[32]

一 “国家生产方式”与空间的政治性

列斐伏尔认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国家还只处于幼年时期，自那以后，国家迈开了巨大的步伐，把对它的理论思考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尽管马克思也曾雄心勃勃地要建立关于政治和国家的理论，在1858年2月至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曾提到他经济学著作的宏伟计划：“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 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 地产；(3) 雇佣劳动；(4) 国家；(5) 国际贸易；(6) 世界市场。”^[33]然而，马克思在他有生之年未能达成心愿，并且，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也未能对国家在扩大化的资本积累中的活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列斐伏尔一方面痛心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能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地”思考国家问题，“尽管在蹩脚的和不完全的意义上，但只有葛兰西理解了统治阶级如何逐渐地标记、模塑和建造了一个经济成为必需但不是充分要素的社会。”^[34]另一方面，他积极寻求国家在资本主义存续中的作用。列斐伏尔同意巴郎（Baran）和斯弗齐（Sweezy）在《垄断资本》中的观点，在当代世界中，很大一部分生产实践不再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交换价值所决定，而是依据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力量关系确定，国家和政治对经济干预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列斐伏尔认为，在生产力的扩张、都市化和空间化的三重进程中，国家越来越清晰地成为空间生产的操控者和管理者，“国家生产方式”产生了。国家生产方式就是以国家控制下的空间的生产为特征，这种社会的理性化和社会化可以被称为“政治化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因此，在现代世界中，国家生产方式和空间的关系成为关键性的。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即“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更新和它们的再生产”，国家、政治权力和日常性形成了一个整体，促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也就是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空间的组织和重构。

首先，国家与空间的关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和政治权力是物理空间的生产的中介。在现代国家中，国家领土、物理空间伴随着道路、铁路、公路、商务和金融系统的建立而被生产出来，它被资本主义的等价网络系统、资本流通所绘制和改变。也就是说，国家领土和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城市都是作为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地点

而被建立起来。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和政治权力作为中介，通过使城市中心化而建立了国家领土和城市之间的新型关系。第二，国家和政治权力是社会空间的生产的中介。法律、习俗等机构作为政治性的社会空间通过“国家语言”传达着资本主义的等级化秩序，这种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建筑物就是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具体的抽象，把各种表征和符号、知识、意识形态、信息的和精神的交流与权力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列斐伏尔认为：“唯一能保证子系统（教学、政府财政系统、信息、司法等等）之间相关联或保证它们从属于整体的是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干预。”^[35]家庭、学校、工厂、教堂等都有自己相宜的空间，满足社会分工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第三，国家生产并占有一个精神空间。这种精神空间是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政治实践的后果。进行意识形态说教的理论家、占据一定空间的组织机构、看似平常的概念和符号，甚至那些静止的建筑物都参与了此实践过程。在这种精神空间中，人们形成了关于国家的表象，似乎，事情的发展理应如此，国家的所言所为皆为正当。与其说是表象，毋宁说是虚假认识。国家也正是通过欺骗来达成自己权力的合法化，从而维护自身的稳定。

其次，国家和政治权力通过多样化的组织和机构确定社会的空间逻辑。马克思曾说道：“交换价值这一前提决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产生，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自然产生，它是一个历史的前提，它已经使个人成为由社会决定的人了。”^[36]如果我们把“交换价值”换成“空间的生产”，就会得到列斐伏尔的结论：空间的生产这一前提绝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产生，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自然产生，它是一个历史的前提，它已经使空间成为由社会决定的空间了。“‘空间’似乎具有理性特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反过来蕴含着实践上的内聚力。这样，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工具（劳动力、工具、原材料等）的再生产、（例如作为整体社会的）公司周边‘环境’的管理、城镇和地域拼图玩具式的安排、‘新社会生活’的宣布等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开发’。”然而，这是国家和政治权力与知识和技术合谋而精心设计的“‘实证主义’的阴谋”。^[37]列斐伏尔认为，是国家并且只有国家能在广大的规模上负责空间的生产和管理，“合理地”规划和组织空间。因为只有国家拥有相应的资源、技术和概念化的能力。比如，国家和汽车工业合作生产了交通网络、加油站、高速公路、停车场、车库、汽车旅馆等。由此，历史城市被由汽车推动的增長的需求重塑。再比如，国家控制电、石油、核能等能源生产，国家把土地和住宅完全纳入市场，推动不动产的动产化等。逐渐地，这样的现代国家成了它重塑出来的“国家空间”的主人。国家和政治权力通过把差异简化为同一性和重复原则而消灭时间，加速了空间的同质的、几何的和量化的特征，从而确立了社会的空间逻辑。

最后，国家和政治权力编织的现代生产体系、社会运行体系和社会生活体系的空间网络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国家和政治权力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全面加强对生活生活的控制和操纵。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列斐伏尔指出，当代国家主要有三方面职能：管理与行政职能、安全职能和镇压职能。相应的，国家扮演着相互冲突的角色：同时是保护者和镇压者、管理者和仲裁人、独裁者和理智者、解放者

和身份认同者。国家已不再只是实施“训导和惩罚”，还承担伦理道德功能，它一方面通过颁布法律、规定，制定禁令和保护行为等直接控制日常生活，一方面通过税收、司法工具、对媒体的掌控等间接地控制日常生活。从前，“不被禁止的则被允许”，而从戴高乐时期到基辛格时期，在一种“虚假自由的意识形态”中，情况变成了“不被允许的一切被禁止了”^[38]。并且，列斐伏尔认为，当今，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各国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伪装成“服务型国家”（a service state），主要通过商品世界这个等价体系和多种多样的“子系统”（例如教育、医疗和健康组织、时空组织等等），日益加强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国家把日常生活模塑为单调乏味的线性重复，生活的风格消失了。“在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古希腊人或罗马人那里，每一个细节（手势、话语、工具、器皿、服饰）都具有特定的风格；没什么是乏味的，更别提是日常的平庸的；平凡的与诗化的生活仍是同一的。……而今，没有风格。”^[39]因此，在国家中，公民正在消失，民主也在消失。列斐伏尔认为，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也许有一天，官僚政府的军队在科技-政治的高度指挥下，不再把日常生活当作一个客体或产品，不再当作一个准殖民地，而是仅仅当作已经被征服过了的国家。”^[40]

总之，从列斐伏尔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它自己的空间，在空间的生产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改变为“国家生产方式”。同时，空间不仅成了生产力要素、生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要素，还完全成为政治性的，政治性的空间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主导性的。空间的政治性主要表现为，首先，空间是意识形态的，它是社会技术专家治国制的表象。其次，空间是实践的，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最后，空间是战略性的，它从属于政治目标，被纳入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列斐伏尔对葛兰西国家思想的评价了。在他看来，虽然葛兰西对现代西方国家具有“强力 + 同意”双重本质的分析在那个时代最有见地，指出了国家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具有麻痹市民社会、窒息人民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愿望的作用，但葛兰西的观点也具有历史性和针对性，国家除了暴力统治和意识形态统治之外，还通过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牢牢地掌控着现代社会。因此，争夺文化领导权已经被“68 革命”证明是不充分的，改变生活首先要改变空间。

二 国家和政治权力运行的微观机制

（一）国家和政治权力的“同质性-碎片化-等级化”

在“国家生产方式”中，抽象劳动和空间的“同质性—碎片化—等级化”图式在国家的行为和权力的逻辑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列斐伏尔认为：“国家行为与这个图式一致：它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41]首先，国家的同质化在一国内部的运转和全球范围的国家-政治一体化中表现出来。从一国内部来说，国家不是税收、军队、司法、学校等各种机构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所有机构都密切相关并服从国家的政治战略。从全球范围来看，列斐伏尔认为，全球国家间的同质性已经在联合国中具体化了。他强

调,规模大小、财富多寡、具体职能、运行机制、操控手段、社会性质等方面的差别都不能成为判断国家间差别的依据。界定国家的世界性体系已经建立的依据是它们干涉经济和社会的方式。其次,国家的同质性不排除碎片化,与同质性一样,碎片化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表现在一国内部的各种机构之间,它们虽然紧密相关,但同时也是独立自主的存在,并且,每个机构为了证实自身、保留自身和完善自身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联合国内部的众多国家也证明了同质性中暗含着碎片化,正是通过碎片化,国家成为世界性的。最后,国家在一国内部和全球的国家-政治一体化中表现出来的同质性和碎片化必然伴随着等级化。一国内部各机构在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不平衡,比如财政体系永远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政府从中攫取国家收入。同样显而易见,联合国包括的众多国家中从超级大国到“第四世界”,等级森严,发展极其不平衡。

(二) 国家和政治权力的隐秘性和弥散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也与商品、货币和资本一样,表现为似乎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和支配人的命运,继续支撑着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然而,空间中或者空间背后其实没有什么未知的或神秘的,正像黑格尔曾嘲讽地说,幕后其实什么都没有,除非“我们”自己走到幕后。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拜物教”是政治层面上引发的空间实践的神秘化,正是国家把复杂多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表现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和透明的,他说,一旦我们掀开帷幕,“权力和知识组织”就显露出来。空间的透明性幻觉掩盖了国家的行为和权力的逻辑,使国家以扩大的资本积累为目的的战略越来越具有隐秘性和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常常表现为可完善的契约和制度体系的组织者,这又提高了国家管理和生产空间的能力,进一步使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呈现透明性的幻象。

同时,国家和政治权力通过“同质性—碎片化—等级化”的图式,用战略取代权力逻辑,在一致性的战略目标的统摄下,把自身分解、渗透到每一个个别的权力体当中,呈现弥散化的特征。“权力,维持依赖和剥削关系的权力,在战略层面没有坚持一个确定的‘阵线’,像地图上的一道边界或地面上的一道战壕那样。权力弥散于各处;权力归属于‘存在’,它无处不在。它弥散于空间中。它存在于日常话语和普遍概念中,也存在于警察的警棍和装甲车中。它存在于艺术的对象中也在导弹中。它在四散的、为数众多的‘可见物’中,也在诸如学校或议会的机构中。它在物中也在符号中(客体的符号和客体-符号的符号)。”^[42]当然,权力无处不在,因而也无处可在。因为它无法完全确定地掌控作为政治工具的空间,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展示的那样,权力越巩固,它越惧怕。因此,权力无处不在的弥散化状态尽管巩固自身,但必然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常常使权力处于恐惧之中。

总之,作为整体的社会仍继续受制于国家的政治实践,这种政治权力在生产和管理空间的进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并使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被加强。为了实现生产关系的

再生产和扩大化的资本积累，国家和政治权力在知识和技术的帮助下，“合理地”规划并全力地控制社会。现代国家俨然成了社会和空间生产的中心。它的战略目标是生产“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被规划的日常”（the programmed everyday）。因此，相应的，都市化和受控的日常生活就成为达到这一宏观战略目标的微观机制。

第三节 空间生产的微观机制之一：都市化

列斐伏尔把城市的组织及其形态的变迁作为理解空间的生产及其历史条件的一把钥匙，并且，他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市组织的分析考察了空间生产的“前历史”。按照列斐伏尔的界定，空间生产的历史就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而 16 世纪到 19 世纪资本积累所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就是在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都市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空间。之后，伴随着 20 世纪新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取代了都市作为资本积累的真正“主体”，在国家和政治权力的管理下，都市的抽象空间生产又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核心，都市化的普遍化实现了空间的第二次抽象。本节将重点讨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和都市形式的构造。

一 城邑、城市与都市

列斐伏尔从术语学角度把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分别命名为“城邑”（ville）、“城市”（cit  ）和“都市”（urbain），相应的，人类历史被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都市时代。但这种历史分期和城市的划分不是泾渭分明和一一对应的，城邑存在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都市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只是被动地开始，只有伴随着工业时代交换的普遍化和商品世界的普遍化，都市才成为人们构造和探索的“大陆”。在他看来，“城邑，是农业时代初期以来人类的一个创造，是一个典型的作品。”^[43]首先，城邑是指一种空间性，它占有一个特定的空间，与农村空间内的劳动分工和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其次，它内含一种社会秩序，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场所。城邑包含着双重秩序，一方面是它对其周围农村的统治、组织和剥削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总体的秩序，比如奴隶制度的、封建制度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再次，城邑中的群体和个人主要通过使用和使用价值来支配时间，交换和交换价值没有摧毁人们对时间的使用。因此，城邑是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作品，而不是排除时间的抽象产品。大约 12 世纪到 16 世纪是历史城市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历史城市是工业时代抽象空间的摇篮。然而，历史城市还保有城邑的特征，时间没有从空间中消失，使用和使用价值还没有被交换和交换价值取代。之后，伴随着工业的建立，经济生产的量的增长产生了质的飞跃，传统城邑瓦解了，都市产生了。但是截至目前，都市社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正在形成当中。

列斐伏尔关于现代都市的讨论主要是以法国城市规划的变迁和巴黎的城市改造为背景的。19 世纪，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Haussmann）一手打造的新巴黎城是资本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从政治上来看，它展现了帝国权力的威严和把巴黎改造为欧洲中心的强力意志；从经济上来看，新巴黎城是资本的节日，金融资本成功地以空间革命的方式化解了经济危机，缓解了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从社会方面来看，交通和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道路、百货公司、咖啡馆、剧院、公园和新的标志性建筑的生产不仅赋予了巴黎新的景观、赋予人们全新的生活体验，更重要的是，伴随着都市转型，空间关系的重组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变革。总之，通过与过去决裂的剧烈的改造，新巴黎城的空间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它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场所，更是现代性本身。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斗争所生产出的空间，“资产阶级打碎了位于巴黎中心的马雷区的贵族空间，把它变成了为物质生产服务和工厂、商厦林立区域。”^[44]巴黎正从古典形态的城邑转变为一个集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以及通过消费而形成的私人占用公共空间的综合性的都市空间。自此之后，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增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深入人心，与此同时，都市建设和都市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列斐伏尔认为，工业社会引发了都市化已经是作为毫无疑义的常识而被人们接受的观点。然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对都市化后果的反思，因为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都市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工业化进程的问题构成。针对都市空间生产的第二阶段，列斐伏尔告诫人们：“值得铭记的是，都市有着不能更坏的敌人，即都市规划和‘都市主义’，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战略工具，用来操控碎片化的都市现实和被控制的空间的生产。”^[45]在他看来，都市化的后果是都市理性，即“都市规划”取代并延续工业理性，成了正在形成中的都市社会的问题所在。

二 都市理性：中心化和同时性

“都市”概念是列斐伏尔针对国家和政治权力对城邑的破坏性重建而提出来的。在他看来，都市不是一种本质，也不是一种实在，而是一种形式，是“全部社会生活的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从土地出产的产品（具体来说：农业产品）到所谓的文化的符号与作品。根据汇合、集中与信息的要求，都市在这一分化、隔离的否定性过程中，表现了出来”。^[46]城邑的分化和隔离形成了以中心性（centrality）和同时性（simultaneity）为特征的都市形式，因此，都市形式既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又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它的精神性表现为同时性，它的社会性表现为集中和汇聚。

（一）自然成为稀缺商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曾经稀缺的商品变得相对丰富，而以前丰富的物品成了新的稀缺。在列斐伏尔看来，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地中海周边城市被改造为工业化的欧洲的休闲空间。以前丰富地、自然

地存在的空气、阳光、山脉、海洋、河流等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是商品，但现在它们被休闲和文化工业占用并生产出来，成了被纳入交换领域的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因此，自然空间在现代都市规划和实践中变成了稀缺商品。当然，这种稀缺是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只有在特定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的空间实践中才能发生。同时，被生产出来的休闲空间如同19世纪资本主义生活中出现的新商品一样具有魔幻般的魅力，因为它表现为一种“非工作”空间，与工作空间相对立。但是实际上，这种人为的和复杂的都市空间服务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扩张，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看似非生产性的休闲空间之所以进入社会分工不仅因为它有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最重要的是它在作为整体的空间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循环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休闲工业生产出来的具象的空间是象征现代文化的人为建造的地点，是比现实生活更具魅力的地点。建造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的满意，而是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不是为了使人成为生活的参与者，成就人的经历，而是使人成为旅游者和产品的空间的消费者。而且，这样的休闲空间当然也是国家和政治权力、经济学家等各种专家和城市规划者们精心规划和组织的结果。国家通过建设高速公路、航空和通信网络，以及节日和假期的安排、相关政策的调整和出台等以保证这种大规模空间的商品化。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又通过这种周密的和周到的“服务”得到巩固和提升。因此，列斐伏尔感叹道：“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通过航空运输完成）中，空间的表象使对具象的空间（阳光、海洋、节日、消耗、花费）的控制变得轻松自如。”^[47]

（二）不动产的动产化

在过去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中，土地曾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而被忽视，建筑业的重要性曾远远不及钢铁生产、制糖工业等。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则相反，土地进入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范畴，在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生产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显而易见，政府的住房规划就促进了这种以“不动产”的动产化为特征的空间的生产。住房建筑与土地不可分割，土地构成住房价值的一部分，于是，被分割的一块一块土地成了空间性的产品。“因而，资本投资在房地产部门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个补充性和互补性的剥削领域。……在一些国家中，比如西班牙和希腊，房地产部门已经成为由相当熟悉的政府干预形式所构成的经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比如日本，求助于房地产部门来弥补通常的生产-消费循环带来的困境并增加利润，这已是稀松平常之事：甚至对房地产部门进行事先预测和规划。”^[48]基于作为整体的空间的生产的新资本主义的增长战略为了实现空间的生产而进行的空间动员开始于土地，然后，这种动员延伸到地下空间和地上空间，从地下的能源、原材料资源、地面的土地资源到地上的被建筑或各种需要分隔出来的空间容量都被赋予了交换价值，作为整体的空间成了一个更庞大的“商品世界”。过去我们买卖或租赁的是土地，而今是房屋、楼层、公寓、停车场、游泳池等各种各样的可交换可计量的碎片化的空间。“空间成为商

品，把空间中的商品特征发展到了极致。”^[49]

（三）从“中心性”到“中心化”

只有自然空间成为商品和稀缺资源，历史城市才被分化和隔离，才会出现中心性问题。没有中心性就不会有都市社会，都市社会的发展就表现为汇集所形成的中心性的辩证运动。因此，都市形式就是一种中心性的逻辑。中心性类似一种逻辑形式，它自身是空的，但需要内容填满。它是自然的和人工的一切物、产品、作品、符号、象征、人、行为以及实践关系的集中和共存。因此，中心性必然包含同时性。如前所述，列斐伏尔指出，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就已经存在都市空间和都市生活，那么，这意味着以往的每一种社会或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它自己的中心性，比如宗教的、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工业的等。列斐伏尔认为，历史地形成的中心性和空间的稀缺都是决策中心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对空间进行组织的结果。并且，在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中，中心性是可移动的，因为都市空间和都市生活的节奏之间复杂地相互关联着。比如，古希腊城市的中心永远是被移动的，从首领和武士分割他们战利品的区域到庙宇，从庙宇到政治集会的场所等。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都市实践中，中心性渴望成为总体上的和不再是可移动的。列斐伏尔倾向于把这种非辩证的中心性叫作“中心化”(centralization)，他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关于空间战略的高层决策；不是欧洲的，不是欧洲的空间战略，而是一个法国的空间战略。换句话说，它描绘着中心化，巴黎的中心化。巴黎必须变成像鲁尔或英国的巨大都市一样的财富和权力的都市核心。这是关于空间政策的政治决定。”^[50]因此，中心化需要更高的政治理性，也就是需要国家或者叫作都市理性以更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和整体上生产空间，通过这种空间秩序的中心性驱逐边缘要素，强有力地集中财富、行为手段、知识、信息和文化。同时，因为中心化是一种政治决定，它还需要技术和知识的代理人，也就是规划者为中心化提供不证自明的合理性。

其实，在列斐伏尔看来，辩证的中心性之所以能非辩证地中心化，是因为空间被生产为同质性的、碎片化的和等级化的。空间的同质性意味着都市空间排除了时间和节奏，可以保证把空间作任意的形式、结构和功能的规划与分割。于是，国家或都市理性可以按照它们的目的把作为整体的空间进行分割、隔离，确定商业中心、信息中心、决策中心和把意义汇集起来并加以共时化的符号中心等。因此，与这种中心化相连的稀缺是空间的并且是局部的，它与特定的空间实践相连。同时，承载相同功能的碎片化的空间必然包含同时性并被赋予等级秩序，比如，商业中心中有众多店铺林立，离中心近的土地资源更昂贵，同样居住功能的空间有独栋别墅和贫民窟的区别等。总之，中心化是由国家或都市理性所管理和控制的中心性，这种中心化所造成的中心和边缘的对立是人为的和更加复杂的。

由此，对于从城邑到都市的转变，列斐伏尔总结道：“这个辩证的过程是这样的：城

邑——工业化带来的破坏——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地重建，即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进行重建。这一过程的推进，伴随着许多越来越深刻的矛盾。现存的生产关系被推广、扩张了；在同时把农业和都市的存在整合起来的过程中，它们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一方面，拥有某些未知的权力的决策中心已经形成，因为这些中心集中了财富、压迫性的权力和信息；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城邑的破坏，使得各种形式的隔离成为可能，各种社会力量无情地将人们在空间中分隔开来。由此，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解体了，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和所有制关系密切相关的那些关系，被集中化了。”^[51]总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权力主持整合历史城市和农业，把地下、地面和地上的空间以及世界范围的空间作为整体进行规划，为寻求日益稀缺的能源、水、光等资源而被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都市空间既是统一的又是分离的，都市空间被分割和分隔成彼此分离又相互叠加的异常复杂的空间碎片，国家和政治权力保证碎片化的都市空间相互联系，同时，国家和政治权力正是通过历史城市的碎片化和中心化建构来保证都市空间的统一性。

三 都市空间的几何性、视觉化和